

2014 No2

滿鐵研究

ManZie YanJiu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

目錄

Contents

- 01 从满铁的“弘報系”说开去 许 勇

論壇

- 02 论满铁综合调查与日本战争国策 解学诗

動態

- 13 日本侵华急先锋“满铁”揭秘 姚友明

文摘

- 15 岩崎昶与“满映” 逢增玉
26 “满映”与电影的国策思想宣传 王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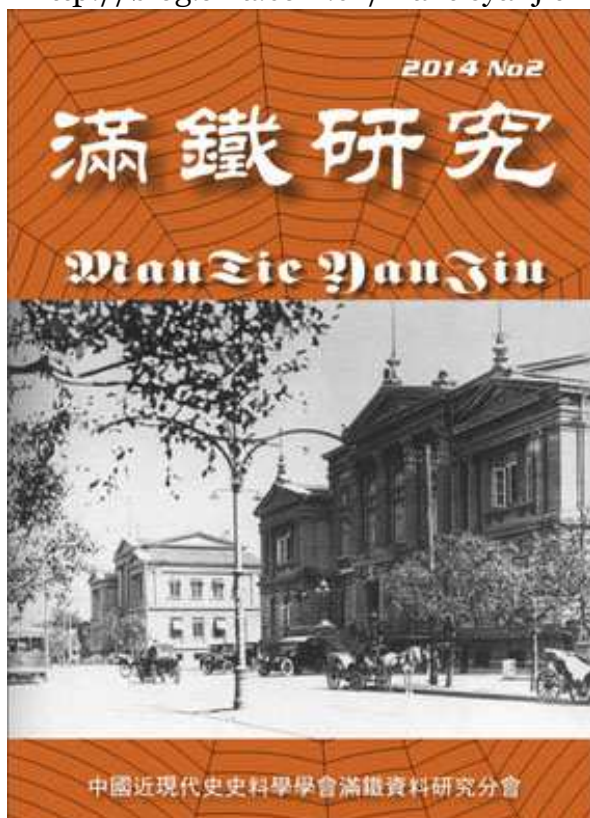
史証

- 32 满铁档案铁证：砸向安倍的重拳 冯 喆

譯林

- 35 夏目漱石的大连五日行 清流一叶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滿鐵研究

MAN TIE YAN JIU

《满铁研究》编委会

主任：张星臣 魏海生

顾问：国 林 葛剑雄 张本义

沈友益 李海绩 李东翔

编委：张星臣 魏海生 韩宝明

郑 兰 刘建设 许 勇

主管：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韩宝明

编辑：《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mantieyanjiu@163.com

地址：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100044

期次：2014 No2（总第 22 期）

日期：2014 年 6 月 28 日

网址：lib.njtu.edu.cn/mt/mtyj.html

版權聲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转载自《满铁研究》”，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徵文啓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揭示历史，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史证、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執行主編：許勇

從滿鐵的“弘報系”說開去

XuYong

“弘報”是个日文词汇，读作“こうほう”亦称“広報”，它的英文解释 public information, public relations；译成中文就是宣传、广告的意思，也可理解为公共关系。早在 1923 年，满铁就设立了“弘報系”，主要负责报纸、杂志的出版发行和照片、广告的摄制制作。之后成立的“满铁映画班”以及“满映”，其业务皆属“弘報”范畴，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为满铁的“国策经营”摇旗呐喊，为伪满的“五族协和”涂脂抹粉，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歌功颂德。满铁的所谓“弘報”事业，是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文装武备”的重要组成，它更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文化浸淫。

本期的「论满铁“综合调查”与日本战争国策」是解学诗教授的一篇力作，众所周知，刺探情报是日本人的天性，这种“本事”被满铁几乎运用到了极致。满铁存续近 40 年间，它的调查部门及其人员，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做了许多所谓的国策性调查，其中就包括解教授文中所提到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战时通货膨胀调查”和“战时经济调查”。虽然中西功、尾崎秀实等左翼人士参与甚至影响了某个调查课题，但从结果上看，“综合调查”的成果，还是为日本军政要员提供了决策依据，起到了为虎作伥的帮凶作用。

「日本侵华急先锋“满铁”揭秘」是一篇新闻稿，出自新华社三位记者之手。在当今中国，除了东三省的年长者以及满铁史的研究者和兴趣者，知道“满铁”的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恐怕比熟悉宫崎骏、蜡笔小新的要少的多。身为炎黄子孙，喊完“钓鱼岛是中国的！”后，应该了解些日本侵华，包括满铁祸华的历史。

「岩崎昶与“满映”」的副标题是“日本左翼电影大师加入殖民文化机构的历史之谜”。岩崎昶是日本著名的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和纪录片制作者，他曾是日本左翼电影的干将，坐过监狱，出狱后为了生存加入“满映”，并担任过多部电影的制片人。战后，岩崎昶加入日本共产党，拍摄进步电影，并热衷于日中电影界的友好往来。“满映”生涯是岩崎昶终生不愿启齿的往事，但透过这段历史，你能深入解读满铁与满映的所谓“弘报”事业。

「“满映”与电影的国策思想宣传」也是论述“满映”的。“满映”全称“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成立于 1937 年 8 月，开办资金 500 万元，由伪满洲国政府和满铁各出一半，理事长为前宪兵大尉甘粕正彦。“满映”的前身是 1923 年成立的满铁映画班，其首任实际掌门人也是满铁的庶务课长林显藏。满铁与满映，一个国策公司，一个国策宣传，其实就是一对狼狈为奸的殖民怪兽。

「满铁档案铁证：砸向“拜鬼”者安倍的一记重锤」是中国档案报记者对辽宁省档案馆藏馆长的采访实录。新公布的 3 份档案，不仅揭露了满铁犯下的种种罪行，还披露了安倍晋三执着参拜靖国神社的家族根源，原来他有一个曾在伪满洲国兴风作浪，外号“满洲怪人”，战后当过日本首相并极端仇视红色中国的外祖父——岸信介。

「夏目漱石的大连五日行」来自一篇博客文章，夏目漱石是个作家，头像被印在日元纸钞上，可见他在日本的知名度。夏目漱石于 1909 年 9、10 月间应邀到访大连，邀请者是他学生时代的好友、时任满铁总裁的中村是公。一个大名鼎鼎的文豪，却不知“满铁”是干什么的，总裁便假公济私成全了这次免费旅行，他也想借助老同学的文笔替满铁做做宣传。吃了人家的嘴软，回到日本第 4 天，《朝日新闻》就开始连载夏目漱石的游记——「满韩とくるところ」，共计 51 期。从日本文豪的字里行间，可以管窥很多满铁的历史原态。

論滿鐵“綜合調查”與日本戰爭國策

解学诗*

内容提要: 满铁综合调查课题是直接关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前途的重大调查项目。此等调查系为适应形势需要所做,也因形势多变而难以为继。调查结果虽都程度不同地触及战时经济本质甚至痛处,但却无一开出可以解除战时经济困境的良方妙药。日本帝国主义倒行逆施的侵略与战争政策的实施驱动力,是谋求侵略扩张利益的冒险与投机心理。帝国主义制度和基于制度而产生的政策反动性质,与调查研究所追求的客观、真实、科学性质,背道而驰。满铁综合调查所标榜的是“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可是倘如果真坚持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综合,则愈是前进愈是对侵略与战争政策的否定,而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更休想直接的“反抗”,和什么“毫不妥协的批判”。满铁“综合调查”实践的挫败教训,从反面昭示一个道理,即:只有顺应人类历史进步要求和代表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事业,才能达成政策选择与调查研究的真正统一,实现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 满铁 综合调查 日本战争国策

前言

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其存在的近 40 年间,调查情报活动始终是其“社业”运营的重要一翼。尤其在 1939 至 1943 年的所谓大调查部时期,满铁调查情报活动达到极至。^① 当时满铁调查部在阐释其自身的“使命”时,将自己定位为日本“唯一调查机关”;并由此而引申出满铁调查的三大特征,即“调查的国策性”、“调查的现地性”和“调查的综合性”。显而易见,居三大特征之首的“国策性”,是满铁调查之魂,其解释是:“基于满铁是负有国家使命的特殊社业的事实,其调查业务自身即带有国策性”,包括其“社业”调查,也不得“有悖于社业的性质”[1] 16-17。而另外两大特征,即“现地性”和“综合性”,说到底,无非是实现“国策性”的可能条件。那么,在满铁存在的近 40 年间,日本的基本国策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就是以中国和亚洲为对象的侵略与战争政策。满铁调查的“国策性”,则意味着在调查目的、过程和成果中,都必须贯彻、体现这一日本既定国策;只能有利于国策,不得有损于国策,更不容改变这种国策。可是在原满铁调查员中却有部分人认为,大调查部时期则非耶,因为该时期“开展综合调查,明确指出战争计划是错误的”,尤其是综合调查的“客观分析的结果,可以成为对日本战争政策毫不妥协的批判”,且“对于战争政策的批判立场构成了调查部调查工作的基础”^②。其实际状况到底如何呢?如此将大调查部时期别具“象征”意义的“综合调查”,说成是与日本战争政策对着干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性调查,是关涉到对满铁调查部根本属性和日本侵略战争政策制定推行的原则性大问题,故不可不分辨认识清楚。

一、“中国抗战力调查”无力回天

所谓“综合调查”,按满铁人员解释,“就是对一定的调查课题,从‘日满华’的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等进行多方面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2] 前言。这本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在满铁调查部,它又是一种调查课题类型。1939 年 4 月,满铁调查部扩大伊始,就标榜“综合调查”,将之置于超越于地方性“一般调查”和现地有关方面提出的“委托调查”等之上的中心地位,并为此而强化了作为“综

* 解学诗,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合调查”支柱的各现地调查机关。其目的自当是为扩大侵略战争，即日本版的所谓“东亚新秩序”服务。

然而，大调查部的头一年——1939 年度的“综合调查”仅仅是各地进行的单个调查项目的简单罗列，丝毫没有收到综合调查的实效。[3] 1-2 原因不单是“各机关人员不足和大连方面（指调查部）联络欠佳”。[4] 1-2 根本问题在于，对形势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而满铁调查部非但对“当前的中心问题缺乏认识，还不善于运用基本调查与政策调查的微妙关系。因而无论是基本问题还是当前对策，也无论技术观点或经济观点，全部混淆在一起，做成了调查项目”[3] 2。

不过，大调查部自认为，1939 年度“中国抗战力调查”和“物资供需调查”还是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前者“成功地实现了基本调查与政策调查的结合，发挥了满铁调查的真面目”^③。可是，“中国抗战力调查”作为满铁调查机关统一进行的“综合调查”而得以立项，多少有些偶然；关于项目的提出和组织的成立，说法上也不尽一致。不管怎样，据称调查部综合课职员具岛兼三郎和野间清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具岛是勇于表明观点而深受领导层信赖的调查员。^④ 野间清称：“该调查的实际发起者是具岛兼三郎，而不是上海方面。”^⑤ 野间清说自己时称：“当时虽然没有社会变革的想法，但是在头脑里经常想对军部的战争政策怎样才能遏制呢？所以，感到重庆抗战力调查是个好主意。”野间清还指出，他和具岛在满铁上海事务所商谈此事时，对方之所以不太积极，主要是考虑进行占领区调查。[5] 61-63 其实，如果上海方面果真表现踌躇的话，原因也不在于调查力量，而在于调查的必要性。因为自“七七”事变起，伊藤武雄所长及其上海事务所从未间断以“和平工作”为名的对华谋略活动，且在 1939 年上半年正值日汪谈判和对重庆策反诱降的关键时刻。惟其如此，后来当伊藤武雄谈及此项调查时，没有说自己是发起者，而只说“中国抗战力调查”是以上海事务所为中心进行的，并称赞中西功“做出了突出成绩”[6] 224，这是事实。

如果说具岛兼三郎是“中国抗战力调查”的倡议者，那么中西功则是推进调查并使调查获得“成功”的核心人物。而这是中西功独具之革命经历、政治立场和胆识才干所使然。调查开始前，他不但恢复了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还与另外的日籍中共党员一道，充任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就是这位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介入调查后，不独根据其“对日作战的战力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众力量”的观点，建议将“重庆抗战力调查”改为“中国抗战力调查”，使调查的内涵得以拓宽和升华；而且以其特有身份和政治理论素养，充分获得和利用了其他人难以占有的资料，并将资料提供给每个调查员分享，以推进调查。据载：中西功通过中国同志可以得到诸如《解放》、《文献》、《时事丛刊》、《求知文丛》、《上海周报》等刊物资料，同时还经常与中国同志讨论有关问题，包括与中共地下工作者陈一峰讨论 1938 年 12 月在上海出版的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这样的重要文献。^⑥

中西功的知遇者尾崎秀实对“中国抗战力调查”的积极作用亦不可低估。作为日本思想界“纯洁无瑕的爱国者和思想家”^⑦，他以满铁东京支社调查室嘱托身份，两度出席“中国抗战力调查会”中间报告会，从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方面给

调查员以启示。他还精辟地阐述了日本政治形势，并对“中国抗战力调查”成果，做了只有他才有资格做的总评。[7] 1-17 他是众所周知的为革命而捐躯的无畏战士，他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历史发展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定信念^⑧，所以他的总评与调查成果一样重要，亦应视为调查成果的构成部分。

“中国抗战力调查”于 1939 年 7 月着手，1940 年 5 月汇总，形成了以《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 14 年度总括资料》为名的报告书，共 5 篇 10 分册；战后 1970 年日本三一书房将其合为一册出版发行。

由中西功执笔的第 1 册“总篇”显系全部调查之缩影与概括，其主要内容是调查的方法论和总结论。方法论实质是理论指导问题，“中国抗战力调查”就是具体地调查分析中国在全民抗战条件下，由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条件与因素的发展变化，从而评估中国抗战能力和战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故称之为方法论。

第 2、3 分册是政治篇。尾崎秀实评论称，中西功执笔的第 2 分册“战时的中国内政”，“是全报告书最高水平之所在”[7] 8。该篇在分析中国各政党动向、社会根基的动摇和社会更加复杂化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众动员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条道路：一是国民党的方向；另一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的方向。”前者，包括战时编成的 300 万新军，都是强制性的，因而不仅难以收到战时动员之效，反而酿成广大农民的离反；相反，后者是根据群众的直接利益组织群众，并以此种组织力将群众向政治（抗日）、军事（游击战）、生产等方面动员。报告书的观点明确：“中国抗战力的据点在农村；动员的基本阶级是农民。”[7] 9 而农民动员势必关系到农业改革和土地问题，并进而触及农村政治民主化和中国统一化等政治大问题。

由津金常知和小仓音次郎执笔的第 3 分册“八路军与新四军”，总结性地指出：“华北形势的发展，是日中战争整个形势发展的缩影，并先行于其他地区近半年”；“华北游击区的发展，已经由对日作战的意义，正在逐渐转向对内革命的意义”。[8] 160-163 至于新四军，报告书则指出了其在牵制日军进攻、扰乱日军后方、配合正规军作战、破坏伪政权、牵制国民党中途妥协、牵制日军向西北进攻破坏共产党根据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报告书中经济问题占最大篇幅：第 4—7 分册是“经济政策篇”，第 8、9 分册为“内地经济篇”。因而，由中西功执笔、编在第 1 分册“总篇”中的“总结报告书”，内容全部是关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国民党管辖区经济政策与经济状况的论述。作为最后结论，他从战争以来的发展中，把政治力与经济力联系起来，考察两者相结合的消长变化。中国为了持续抗战，必须强化军事、统一政治和重组经济。中西功认为，内地经济虽极困难，但“重庆政权无论如何还未达到毫无办法的地步”。问题是“其政策极其恶劣”。如果能对“表现为五千年传统的农业经济”，拥有把它们适当组织起来的智慧、意志和手段，“即使是极原始的方法，在量的方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政治重组是前提条件。“然而，这种重组的内容，不是既有统治阶层的统一或重组，而是以阶级性的组合为内容。也就是，其本身是深刻的阶级斗争，所以，是中国抗战力的最大问题。”中西功指出：“中国

政治上动摇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决裂，其次还有民族资本与地主的分裂，这方面‘已由南京[指汪伪]同重庆的对立表现出来’^⑨，至于前者，即国共之间“并非没有分裂的可能性，不过现在还是存在着继续合作的可能性的”^⑩。而在 1940 年末，中西功稍带乐观地表示，中国事变再次显现出持久的局面，真正的政治优越于军事的局面出现了。

上述调查成果，经过三次中间报告后，从 1940 年 6 月 1 日到 7 月末，向诸多方面广泛地做了报告。“在满铁的综合调查中，将汇总的成果用活版印刷形式得以作为文书保留下来，同时从东京、奉天、新京，到上海、南京、北京多次举行报告会，大规模口头报告其内容，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5] 60。许多日本军政高端人物，诸如满铁总裁大村卓一、关东军参谋长饭村中将、上海武官府岩村武官长、阿部大使、中国派遣军板垣总参谋长、华北派遣军多田司令官等，都曾坐在那里洗耳聆听满铁调查员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的报告。

满铁调查报告居然如此受到青睐，固然与报告别开生面的内容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报告所揭示的中国抗战力，恰是战局发展关键时刻战争决策者和推行者们判断形势的需要。因为，武汉战役后，日本的“速战论”破产，他们不得不接受战争长期化，即日方所谓“大持久”的现实。可是，日本还是妄图采取军事压力与政治谋略相结合的办法，尽快征服中国。1940 年 1 月 1 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提出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秘指导》要求，“以至昭和 15 年[1940]秋季左右为目标，特别努力解决事变。在强化促进汪工作的同时，进行对重庆工作。适时捕捉对重庆停战时机，并指导汪、重庆合流。”[9] 583 当满铁调查员们进行如上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时，日本侵华军部正积极推行其方针：一方面，派遣军今井情报部长进行对重庆的“桐工作”[即 1940 年 5 至 9 月在香港与蒋方宋子良秘密谈判]；另一方面，配合进行“宜昌作战”等军事施压，图谋使重庆方面降服。所以，满铁调查报告比较强调“政治解决”，是同当时日本侵华战略策略相一致的。满铁调查部曾理直气壮地声称，中国抗战力调查是在“与总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密切联络下”进行的。[1] 32

有的日本人士认为，中国抗战力调查的结论是：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却能在战争中实现革命性变革，这种看法并不错。因为，中西功等主导调查的少数左翼调查员，他们的理论和贯穿在报告书中的观点确乎如此。不过，调查报告所传达的中国“敌情”信息，和从中国情况中可以引申出来的某些思想观点，是两回事。况且，一、站在帝国主义立场的人们，不可能认同报告书中的观点；二、在天皇制专制主义下推行的军国主义侵略路线，在其营垒内无以产生足以使形势逆转的力量。所以，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不具备遏制战争的回天之力，也谈不上是对战争政策“毫不妥协”的批判。倘如报告书果真主张从中国败退，他们所面临的就不单是冷眼和微词，而是坐牢和杀头了。日本决策者们饶有兴趣地关注报告书，就是因为它是情报，且系战略情报，至于报告书中所渗透的思想观点，他们没有兴趣。因而，“中国抗战力调查”只是“火”了一年，其地位即被其他调查项目所取代。

二、“战时通货膨胀调查”逼进死巷

1940 年度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中心项目，由政治性的“中国抗战力调查”，转为经济性的“战时通货膨胀调查”。导致如此转换的因素，与其说是调查部的主观自觉和认识改变，毋宁说是客观形势剧变与恶化之所致。其实，前此的 1939 年情势已经生变：侵华战争长期化，欧洲战争爆发，战时经济出现破绽，等等。

满铁调查部于 1940 年 1~2 月召开会议，讨论因应当时紧迫形势之当前基本调查课题时，得出的看法是：“我国[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由于事变的长期化和内外形势的激烈变化，暴露了根本性矛盾，遇到了巨大障碍。如不迅速制定根本对策，不要说成为处理事变的大理想的东亚新秩序建设，就是推行现在规模的战争都将是困难的，形势发展是紧迫的。”[10] 15-29 因而满铁调查部的调查研究应该对预计在 1940 年下半年即将发生的国际禁运危机，尽快提出具体对策，这是其一；其二，日本战时经济矛盾不限于个别层面，业已扩及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生产下降，流通混乱，物价高涨，生活恶化，且事态已扩大到“日满华”全域，互相影响，从而更加剧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矛盾，形成恶性循环。有鉴于此，1940 年 3 月的调查部首脑会议决定，将“日满华通货膨胀对策调查”，作为 1940 年度综合调查中心课题，因为，通货膨胀成了战时经济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根据调查部计划，除调查部综合课担当“日满华各地区通货膨胀相互关联性及其对策”的项目外，日本、“满洲”、华北、华中等地的“通货膨胀及其对策”，分别由东京支社调查室、新京支社调查室、华北经济调查所、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分头进行，最后的“结论”汇总，由各机关合作进行。

计划要求，“必须将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特殊性，和以此为基础的通货膨胀特殊表现的阐述作为重点”；至于调查目的，“不止于研讨通货膨胀发展过程及其原因”，还要“认清最近将来通货膨胀的发展，并为抑制通货膨胀提出政策方向，为政策的制定揭示基本条件”[11]。

3 月份敲定的项目，计划 9 月末完成，实际上 8 月才开始调查工作。因而主要利用既有调查资料，并将会议交流作为推进调查的重要环节。不言而喻，调查的根本企求，在于获致遏制通货膨胀对策，且调查系在马上就要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紧急关头开始的。故在调查开始仅仅 1 个月后就召开了中间报告会议，并将议题中心放在政策制定方面。在 9 月 9 日至 14 日为期 6 天的会议上，调查部和各地代表讨论了各地通货膨胀的诸多方面和调查成果汇总问题；但至关重要是，根据调查部综合课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日满华通货膨胀对策制定方法》的备忘录，以期“制定政策时避免不必要的混乱”，而其内容则是“制定对策的前提条件和界限”，即：“实行原有规模的军事支出，即事变继续进行”；“不得回避为确立高度国防力所作的投资”；“政治、外交方向一应置之度外”。[12] 简言之，就是战争继续，和军事开支与现行政策不变。这是拟定对策时必须绝对遵守和不得逾越的底线。

根据第一次中间报告会决定，于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9 日在东京召开的第二

次业务报告会议，虽然讨论了各地区通货膨胀情况与对策，但因各地所提出的资料不足，综合对策“未能具体化”。于是，调查部长田中清次郎亲自出马，于11月13、14日召开通货膨胀调查委员会会议，最后审议各地总括报告和“日满华”集团遏制通货膨胀综合对策。可是，调查委员会中岛干事长却强调称：“从现阶段的认识看，有许多困难问题，特别是各地在制定综合对策上不能不说是难中之难。调查、结论、对策等方面都留下不充分之处，特别是对策，就是指出今后方向都特别困难。”[13] 6-7 满铁甚至承认：推出充分的调查成果，拿出具体对策，“以满铁调查部这样调查机关之力毕竟是不可能做到的”[14]。满铁的调查行动碰壁了，认输了，承认局限性了，也对自己一贯标榜的“国策”产生怀疑了。原因何在呢？

且将野间清等编《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报告集》中关于日本经济情况的一段话展示如下：

一方面，依靠缩减和平产业，强制实行大规模的用于军事消耗的生产力扩大；另一方面，为此而膨胀财政，放出无限的资金。此种消费资料与货币购买力的不平衡，表现为物价的全面上涨。因而，在现阶段，消费资料部门再生产缩小、生产资料部门全面停滞和部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劳动生产率下降、国民生活变化、社会不安等等，已陷入所谓的恶性循环。[2] 39

恶性循环也同样发生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华北以至华中南。中国各沦陷区无不向日本提供军需，无不向日本供应战略资源。战争经济资源掠夺给沦陷区造成的社会再生产、经济流通、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困难、矛盾与危机，远比日本国内严重。总之，侵略战争和战时经济体制与政策，是导致“日满华”全城通货膨胀的根源。而通货膨胀调查就是面对这种严峻事实，分析矛盾实态，找出遏制对策。可是，如前所述，调查时特别是提出对策时，都不得踏过第一次中间报告会规定的前提与界限，即不得否定现有规模的军事开支、建立高度“国防力”和现行政治外交政策这条底线，一句话，不得质疑和反对侵略战争。这就将通货膨胀调查逼进了死胡同。

事实表明，不单关于“日满华”全局的“综合对策”难产，而且各地区勉强提出的各该地区对策，也都是无法操作的敷衍性纸上谈兵。

由于满铁各现地调查机关不约而同地都将无法兑现的对策当作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拿出来，所以，日本学者原觉天称其为“理论矛盾”。[15] 其实，哪里是什么“理论”问题，完全是调查失败和应对失败的无奈。满铁调查部自知其通货膨胀调查的分量，故与“中国抗战力调查”不同，进行了低调处理，只在兴亚院和企画院举行了两场极其简短的报告座谈会。

三、“战时经济调查”半途而废

迫使受挫的满铁综合调查继续再走一程的也还是客观形势。原来预料的1940年下半年开始的严重危机，果然发生了。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后，10月起美国对日本实行废铁禁运；1941年3月美日谈判破裂，7月日本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英荷等国随即冻结日本财产，停止供应石油等战略物资。日

本由于缺乏资源，钢铁工业主要实行废铁炼钢法，石油等战争物资非常紧张。上述这一切，是致命地捏了日本战时经济运行的脖子。日本当权者为了继续侵略战争，支撑战时经济，处心积虑强化殖民地占领区的掠夺，打造“日满华”“为一体的经济态势”，同时开始谋求战时经济改组。1940年12月7日日本内阁推出《确立经济新体制要纲》。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战时经济改组，重组国民经济再生产结构，是使“国家”掌握战时经济体制，推行侵略战争。满铁调查部正是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放下未能寻觅出具体对策的通货膨胀调查，或者说绕开通货膨胀调查无法找到对策的困难，而着手以“战时经济调查”为名的经济改组调查。

这里所说的战时经济改组，不仅是以“放弃过去的依靠英美的方式，必须主要通过大陆把握的方式来实现”为前提，而且还要把调查放在对“日满华各该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上”，以查明改组经济的各种条件。故此次经济改组不同既往，它不是“主要通过流通领域战时统制政策的推行以求实现的措施”[16] 40-41。这谈何容易！可调查部首脑决定：“多么困难和需要多长时间都必须进行”，要求“半年内得出结论，一年内拿出成果。”[16] 6 在1941年8月18日起为期三天的临时干事会上，终于推出名为《为确立日本重工业自主性的调查要纲》的战时经济调查课题。结合“要纲”所附“说明书”(11)，我们可以了解到调查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一) 日本重工业自其诞生起即带有军事性质，在负担大量军需的情况下，之所以还有可能继续相当迅速的积累，主要是利用了以落后农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积累，和从“第三国”进口重工业所使用之机械设备及原材料。这称之为农业、轻工业劳动者的“旧型负担”，“大陆把握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外延”。而日本社会再生产与流通结构的此种特殊性，则导致重工业之对英美依赖性，依赖的结果，又形成重工业原料结构的脆弱性、低品位资源利用滞后、技术水平低下，和由于机械工业幼稚而造成的重工业自身结构的脆弱性。于是，“随着日中事变进行而形成的军需激增与对第三国贸易关系的淡化，上述结构便面临解体危机，呈现出日本国民经济及满华经济全面缩小再生产的态势”。为了断绝对美英的依赖，确立日本重工业自主性，“必须克服如上结构性制约，建立新关系下的积累方式”。这就是战时经济调查要纲规定的第一个调查重点，即查明“日满华战时生产、流通结构特性及其平衡条件”的缘由。

(二) 日本重工业现状也明显影响着企业经营，即：随着缩小再生产的持续而带来的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停滞愈益加剧。因为推行战时生产力扩充计划，导致固定资本迅速增加、成本提升和价格遏制，等等，上述重工业结构矛盾，在这里成为企业经营问题而存在。因此，第二个调查重点置于“把握日本重工业资本集中的特性、重工业与其他产业以及大陆落后的价值补贴关系，和重工业利润下降实态”。

(三) 第三个调查重点，主要分析“作为实现日本重工业自主性基础条件”的农业生产关系，掌握生产手段中属于中枢地位的资本和劳动者的形成，以及伴

随战时经济进展，生产诸关系的变化，和在变化着的实体中，怎样表现为使日本重工业得以自主的新体制细胞。所以，称作是“综合性把握”。

总之，战时经济改组调查，是解剖现有经济关系，从中找出“新体制”萌芽；或者说是图谋改变现有社会再生产结构，重组所谓“自主性”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战时经济体制。问题是实现的可能性何在？

光是对调查实施计划就进行了四、五个月讨论，到 1941 年才着手调查，其间形势又生剧变。同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先是妄图趁火打劫，决定“北进”，即“在德苏交战进程对帝国有利时，即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12），并开始了以“关特演”为名的空前军事大调查；旋又鉴于远东苏军并未大量西调，乃又改为“南进”，特别是 9 月 6 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以 10 月下旬为目标完成对美、英、荷等国的战争准备。（13）在如此紧张局势下开始的战时经济调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即 11 月和 12 月，在日本企画院接连举行两次中间报告会。

在会上，各现地调查机关虽都提出了各自的调查中间报告，但惟以“新京”支社调查室的中间报告最受关注。该报告书明确指出日本经济“支配”满洲经济的特殊三形态，即：（一）“通过农产品与消费资料交换而显现出的不等价交换”；（二）“依靠政治权力征用农产品和劳动力的现地自筹”；（三）“日本资本通过劳动力使用实行吸取价值的近代生产方法”。（14）三者间，特别是（一）（二）同（三）构成了“满洲经济的本质矛盾”。因为，“满洲”重工业是殖民地性质产业，主要靠满铁的铁路运输业发展而形成，而以铁路为主导的诸产业，如车辆制造、煤炭及燃料生产、金属原料生产等，都是通过对低工资工人的使用，和以铁路收入为担保，或用铁路收入直接投资而发展起来的。至于重工业的低工资劳动，实际体现的是高额地租生产关系和农产品与消费资料不等价交换关系。由于此种关系，农村分化出现扭曲，即不是富农与农业工人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而是土地耕种零细化的普及，农民只靠农业无法维持生计，于是成为外出打工的劳动者流向工矿业。这样农家经济才得以维持，企业使用低价工人成为可能。可是，流向工矿业的劳动力质量低下，因而成了“满洲”难以发展精密机械工业等重工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报告书的结论是：日本经济“把握满洲”的“新方向需要从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把握，向立足近代生产方式的把握推进”。

在东京的报告会和与企画院的座谈会上被讨论的该报告书，虽非决定性报告，但却揭示了日本“把握满洲经济的新方向”。然而，根本疑问在于，历史上一贯实行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榨取关系，有可能在战时为建立重工业“自主性”，而一朝一夕骤然废除吗？况且，战争已在太平洋全域展开，满铁调查部已经认为“在现有体制下，重工业自主性已无希望实现，可是除经济重组之外即资本主义重组之外，日本战时经济没有存续之路”[2] 前言。可是调查却继续进行。1942 年 3 月，各现地调查员齐集大连调查部进行汇总；4 月初推出《为确立日本重工业自主性调查——汇总整理目次及资料》。① 1942 年 5 月，在企画院官员全部参加下，举行了报告会，当时调查所得的结论如下：

1. 日本官营企业设备、技术，和以巨大重工业资本为中心的技术实行重组，

及优秀劳动力培养。

2. 作为对日本重工业基本原料供应者，确立以满洲炼铁业为中心的利润补偿体制，并转换补偿源泉；把握华北采煤业生产过程，并为其引进资本与技术。

3. 为向日本重工业提供劳动力，和向外提供大量移民，以哺育中农为中心，改善日本农业生产。为向日本提供粮食，向满洲重工业提供劳动力和粮食，向华北重工业和产棉区供应粮食，以富农为中心，改善满洲农业生产，并与重工业补偿源泉转换相结合。

4. 对于日本战时经济、亦系满洲经济牺牲转嫁集中点的华北，为排除因通货膨胀发展给它增加的向日、满供应煤炭、棉花、劳力的障碍，增加满洲农业生产，增多对华北的补给，日本增加对华北必需品的供应。同时，从政治上确保华北农业生产地区，并以中农以上为对象，从搜货条件考虑推行增产对策，依此创建一种阻止中共进入的条件。

5. 由于日本经济原来的大陆把握方式，向以农业为中心的满、华转嫁牺牲，造成大陆开发的停滞，和因不等价而受阻，以及轻工业原料被切断，故应以纺织业为中心向华北及华中转移资本，和为确保原棉，创造日本轻工业对农业的新的把握形态。[17] 15-16

显然，这里只是展示战时经济改组的大致方向和粗略设想，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性具体举措，全未触及。调查仍处于中间状态。且因太平洋方面正在酣战，还要策划如何“战胜美英”，和“向南方地区转嫁牺牲”等问题。故于 1942 年 5 月调查部仍将战时经济调查列为该年度综合调查中心课题，并将调查目标从“日满华”扩大为“东亚共荣圈”；调查重点置于“查明在东亚共荣圈中以确立日本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基础条件”[17] 10-12。可是，华北经济调查所在审议 1942 年度战时经济调查时，即对满铁调查机关从事战时经济调查之类的调查提出质疑；实际上，是调查员们在战时法西斯高压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继续从事势必触及日本对殖民地占领区“把握方式”等颇具敏感性的调查，感到畏惧了。特别是同年 9 月数十名调查员被捕的调查部事件发生后，虽然事件不是因综合调查而起，也并非是针对战时经济调查项目，但战时经济调查却由此而终止。10 月中旬在大连举行的战时经济调查“中间碰头会”上，只有几名调查役露面，实际调查担当者们全未出席。至此，战时经济改组问题毫无找到出路，也没有人再找出路，而且出路也是没有的。

结语

满铁综合调查课题还有其他项目，例如“中国惯行调查”等，也颇重要。但是，如上三大课题是作为综合调查中心课题而举调查部全力进行的，且系直接关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前途的重大调查。此等调查系为适应形势需要所做，也因形势多变而难以为继。调查结果虽都程度不同地触及战时经济本质甚至痛处，但却无一开出可以解除战时经济困境的良方妙药。一位满铁资深调查员曾经指出：综合调查自始就是无意义而不会得出结果的，更侈谈对“国策”的“反抗”。

“不能否认，在调查部的综合调查中，包含着在正确认识现状的基础上，思考出

合理的政策向日本领导者进言的意思”。可问题正在这里，因为军部和政府隐匿真相、歪曲现实、垄断资料，要想“正确而详细地把握现状，自始就是不可能的”，“而且作为调查结果而提出的结论，可以说自始就是明摆着的。简言之，再继续进行战争，从经济方面说已无可能了，很明显经济上的破绽已达到部分修补无济于事的地步。而将这样的结论置于军的面前，有什么效果呢”？[18]

其实，问题的基本并不在于调查做得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决策者不可能正确对待决策、施策与调查研究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倒行逆施的侵略与战争政策的实施驱动力，是谋求侵略扩张利益的冒险与投机心理。帝国主义制度和基于制度而产生的政策反动性质，与调查研究所追求的客观、真实、科学性质，背道而驰。满铁综合调查所标榜的是“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可是倘若果真坚持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综合，则愈是前进愈是对侵略与战争政策的否定，而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更休想直接的“反抗”，和什么“毫不妥协的批判”。满铁“综合调查”实践的挫败教训，从反面昭示一个道理，即：只有顺应人类历史进步要求和代表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事业，才能达成政策选择与调查研究的真正统一，实现科学的发展。

注释：

①满铁调查部的名称只存在于1907至1908年、1938至1943年，其他时间为调查课、经调会、产业部、调查局等。1939年起的大调查部时期，人员近2500人，并拥有多个现地调查机关。

②1984年2月17日三轮武在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满铁调查部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井村哲郎：《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亚洲经济研究所刊行，1996年，第610页。

③满铁上海事务所：《关于时局和调查部运营的若干考察》，《部报》，第13号（通卷），昭和16年9月，第2页。

④具岛兼三郎在1942年满铁调查部事件中被捕入狱，战后任九州大学教授、校长。

⑤野间清，1941年任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役，后任伪中央储备银行顾问辅佐，1942年在调查部事件中被捕，战后任爱知大学教授。

⑥《中西功讯问调书——贡献给中国革命的情报活动》，亚纪书房，1996年，第288—290页。陈一峰系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站战略情报员，掩护身份是中央社首席记者和汪伪特工总部顾问。

⑦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编、那庚辰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9页。尾崎秀实是佐尔格“共产国际谍报国”核心成员，1941年被捕，1944年被处死。

⑧尾崎秀实入狱后曾对世界革命形势做了系统展望，最后称：“我对根本的历史规律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⑨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1940年，第3分册，第123页。

⑩中西功：《关于日中事变的阶段性划分》（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参考资料），1940年2月23日，油印本。

(11)《部报》，第13号，昭和十六年9月，第31—33页。以下有关该问题的引语，均出于此。

(12)1941年7月2日御前会议决定《伴随情势推移帝国策要纲》，日本外务省：《日

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 下, 1955 年, 第 531—532 页。

(13) 1941 年 9 月 6 日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遂行要领》,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 下, 1955 年, 第 544—545 页。

(14) 满铁新京支社调查室:《在东京的满洲战时经济调查中间报告概要》, 野间清等:《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报告集》, 亚纪书房, 1982 年, 第 887 页。

(15) 该报告书共 5 册, 第 5 册为总结论部分, 但迄未见到。

参考文献】

- [1] 满铁调查部. 满铁调查部概要[M]. 油印本, 昭和十七年 9 月.
- [2] 野间清. 等. 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报告集[M]. 亚纪书房, 1982.
- [3] 满铁上海事务所. 关于时局和调查部运营的若干考察[M]. 部报: 第 13 号(通卷), 昭和十六年 9 月.
- [4] 调查部长. 昭和 15 年调查部基本方针[M]. 满铁调查部报: 第 1 卷第 1 号, 昭和十五年 5 月.
- [5] 石堂清伦. 等. 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M]. 原书房, 1986.
- [6] 伊藤武雄. 生活在满铁[M]. 劲草书房, 1984.
- [7] 尾崎秀实. 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十四年度总括资料[M]. 满铁资料汇报: 第 6 卷第 4 号.
- [8] 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 昭和十四年度总括资料[M]. 第 1 分册, 1940: 第 3 分册.
- [9] 现代史资料-9: 日中战争(2)[M]. みすず书房, 1964.
- [10] 综合课. 关于统一的业务计划[M]. 满铁调查部报: 第 1 卷第 1 号, 昭和十五年 5 月.
- [11] 调查部综合课. 日满华集团通货膨胀及其对策调查计划[M]. 满铁调查部报: 第 1 卷第 1 号, 昭和十五年 5 月.
- [12] 综合课. 统一业务计划日满华通货膨胀调查第一次中间报告会议经过及协议事项[M]. 满铁调查部报: 第 1 卷第 5 号.
- [13] 综合课. 日满华通货膨胀调查综合委员会概貌[M]. 满铁调查部报: 第 1 卷第 8 号: 9.
- [14] 满铁调查部报: 第 1 卷第 9 号[M].
- [15] 原觉天. 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M]. 劲草书房, 1984: 922.
- [16] 日满支经济改组目标与主要问题[M]. 满铁调查部报: 第 1 卷第 10 号: 40-41.
- [17] 总务课. 昭和 17 年度业务计划作成经纬报告: 附件 2——为统一理解综合调查的说明[M]. 部报第 16 号(通卷).
- [18] 野野村一雄. 回想满铁调查部[M]. 劲草书房, 1986: 407. ^NU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7 年 5 期第 248~256 页

日本侵華急先鋒 “滿鐵” 搗秋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赵梦卓 刘硕

吉林省社科院最新研究成果表明，1906年设置于我国东北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虽对外宣称是民营企业，但实际是日本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且承担着为日军侵略行为搜集情报的特务职能。在“满铁”存在的近40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几乎所有的重要侵华行动都与它相关，“满铁”的存在过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缩影”。

“满铁”是日本在华最大的殖民机构，以铁路交通为主业，主要掠夺煤铁等战略资源，并全方位渗透到工商、农、林及移民等各领域，获取了高额殖民利润。它表面只从事经济行为，但实际却是不着军装的侵华“急先锋”。其所收集的情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为武力侵略进行了充足铺垫。

“满铁”研究专家、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解学诗介绍说，1927年田中军内阁时期，出任“满铁”总裁的三井财团和政友会首脑山本条太郎，为推行东方会议中决定的侵华“积极政策”，外交上逼迫张作霖签署“满蒙新五路”协约，积极推行急剧扩张的“满铁”“新经营策”，使张作霖彻底傀儡化。

研究显示，“九一八”事变前夕特被任命为“满铁”总裁的日本政界元老内田康哉，事变后陡然倒向关东军，由“币原路线”首要执行者摇身一变成为拥军死硬派，最后甚至沦为推行“焦土外交”的吹鼓手。在政府与军部之间“游走”的特殊官僚松冈洋右，“七七”事变前后正担任“满铁”总裁，他让“满铁”实现了符合军意并突出铁路、煤矿、调查三大重点的改组，从那时起，“满铁”步入全力服务侵略战争的快车道。

解学诗说，“调查情报”是“满铁”独居特色的事业与活动，其机构遍布中国与日本，核心调查员多达2500人以上。调查活动的目的，是从方方面面了解中国，从而有效制订对华政策；另外，“满铁”对我国东北的调查广泛且深入，不仅涉及矿产资源的调查，而且还有涉及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的调查。其存在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难以计数，有些文物没运回去的，留在现在的抚顺博物馆中，其中很多是国家一级、二级文物。

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郭洪茂说，“满铁”还经常找借口借来一些民

用通信网络，利用电信电话监听中国情报。“九一八”事变之前，“浪人”到中国来混饭吃搜集情报，这些人都是军人出身，平时看着不起眼，伪装成小商贩、医生等职业，在战时他们立刻转变为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研究显示，到 1944 年，“满铁”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国中国”：其员工已经达到 50 万人，其中包括 20 万日本侨民以及上万名日本退役“在乡”军人。他们有家属、有孩子，所以需要配有学校、医院等设施，并借此不断扩张。

据介绍，在日军投降之前，大量与“满铁”有关的档案被销毁。郭洪茂说，1945 年 8 月 10 日，关东军就得到“风声”，要求立即销毁战争罪证。曾任“731 部队”伙夫的中国人陈贵说，原先“731 部队”的焚尸炉，当时被用来烧文件。期间战时很多日军的军务机密被烧毁，焚烧工作有专人监督并负责汇报，文件销毁工作前后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星期。尽管如此，这一“20 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文献资料库”仍有大量档案文书和调查报告保存下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专家认为，“满铁”是帝国主义实行殖民侵略的世界性典型案例。虽然帝国主义侵略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应根据更多历史资料重新审视并解读“满铁”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为全面还原历史、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言行提供充分的史实支撑。

资料来源：2014 年 5 月 4 日 新华网日本频道

岩崎昶與“滿映”

——日本左翼電影大師加入殖民文化機構的歷史之謎

逢增玉

1939年，原宪兵大尉，劫持溥仪到东北建立满洲国的甘粕正彦，被伪满当局委任为“满映”理事长。上任后，出于既更好地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国策鼓吹效力，也为满洲建设亚洲一流电影公司的复杂心态，甘粕正彦积极地从日本国内聘来大批电影人才。这批人才中，也包括一些左翼的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电影人。其中，日本著名左翼电影艺术家、批评家岩崎昶，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极端右翼的，狂热信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关东军有极深关系的前宪兵大尉甘粕正彦，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敢于如此超越意识形态和国策重用岩崎昶这样政治上对立的人，恐怕他自己也未必完全说得清，这是“满映”历史上的一段“斯芬克斯之谜”。

岩崎昶，1903年生于东京。这位著名的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及纪录片制作者，1927年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文学系毕业，在大学时代就开始研究电影并撰写电影评论，赢得一定名气。1928年开始投身于日本的电影事业时，正值红色思潮席卷世界之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勃兴，苏联对革命的有意输出，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危机，都使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发展壮大，知识分子普遍地“左倾”化，法国的巴比塞、罗曼·罗兰都以朝圣的心态访问苏联，英国贵族出身、剑桥毕业的哈洛德·金·菲尔比和他的同事加入苏联克格勃特务组织，这个绅士风度的贵族豪门成为苏联安插在西方的最出色的间谍之一，而他之甘愿为苏联卖命，并非为了金钱美女，而是鄙视英国贵族和社会而信仰共产主义——那是当时弥漫世界的思潮。就连没有诞生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认为是新大陆的美国，纽约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成气候，左翼杂志《党派评论》《新群众》也搞得热热闹闹。在亚洲，由于日本最早学习西方成为工业化国家，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在日本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政治家和学者学习马克思主义，都是通过阅读日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由于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体系，日本也随着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而连带地发生经济危机，并由此产生社会危机。因此，红色左翼思潮同法西斯主义思潮一样（德国、意大利亦复如此），在日本兴起泛滥，日本也进入红色三十年代的漩涡，大批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和作家成为左翼的思想俘虏，而且，日本的左翼思潮也影响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成为这些国家左翼思潮的源头之一。

岩崎昶大学毕业投身文化和电影事业时，正是日本的左翼思潮弥漫之际，在大学学习和掌握德文的便利，使他得以阅读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著作，思想早已受到影响，因此毕业后来社会，他便很自然地卷入到左翼思潮里。于是，1929年2月，岩崎昶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为了实现他“电影只是为了革命”、①为了通过电影表现“普罗列塔利亚”（俄语“无产阶级”的日语音译）

大众的生活，进而唤醒他们参与社会革命、埋葬资本主义的理想，岩崎昶以自己著作的版权购买 16 毫米电影摄影机，用三个月的时间，以偷拍的方式，拍摄了纪录片《柏油马路》，真实地把东京普通人民毫无矫饰的现实生活生动地记录下来。1930 年，日本共产党发起的“五一”劳动节，有多达 3 万的各界劳动者参加，岩崎昶受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的委托，组成 6 个摄制组，冒着被警察逮捕的风险，拍摄了集会纪实纪录片，主编为《第 11 次五一国际劳动节》（两本）。1931 年，又以同样的方式主编了《第 12 次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日本唯一现存的战前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纪录片。

但是，随着日本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为了使举国上下纳入侵略战争的战车，日本国内的思想镇压和白色恐怖日益严峻，各种左翼组织随着日本当局的一次次大检举而几乎弹压尽净，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转入地下后被捕死亡，大批左翼作家和文化人转向，如川端康成这样的一度左翼的青年作家都或转向或缄默。在这样的境况下，作为左翼电影干将的岩崎昶，也离牢狱之灾不远了。1938 年 11 月 29 日上午，左翼杂志《唯物论研究》的重要成员冈邦雄、户坂润、永田广志、古在由重等三十多人，一起被检举逮捕，罪名是“违反治安维持法”，是为“唯物论事件”。1940 年 1 月，日本政府又对“唯物论事件”进行第二次检举，岩崎昶与今野武雄等 12 人被捕。两次检举以后，日本当局用数年时间从读者手里追讨回近三千余册的《唯物论研究杂志》，被检举逮捕的人数多达百余人。

唯物论研究会是在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和势力猖獗、左翼文化运动不断遭到激烈镇压和解体之际，由日本共产党暗中支持的，以学习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以研究唯物论为目的、众多团体组合起来为目的而兴起的日本左翼社会团体，于 1932 年 10 月结成。发起人有长谷川如是闲、大塚金之助等四十余人，发行《唯物论研究》月刊，出版《唯物论全书》并举办演讲会和研究会。遭到日本当局两次检举逮捕后，于 1938 年 2 月解散学会，杂志改名为《学艺》。“唯物论事件”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天皇政府为了进行和扩大战争，把倡导反战和平的日本共产党、残存的左翼运动势力一网打尽而实施的文字狱性质的镇压行为。这个大检举和大逮捕涉及的人数众多，很多人入狱后因营养不良、身患疾病而死去。

岩崎昶也因为“唯物论研究会”事件，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逮捕，未经判决监禁于拘留所。除了唯物论事件，岩崎昶入狱的原因还有他反对以国家统制为目的的电影法（映画法）。这次大检举大逮捕可以说彻底摧毁了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和左翼势力，使全国笼罩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高压和白色恐怖中，也使得举国顺利纳入军国主义的战争体制。也许是这次大逮捕的广泛和镇压的残酷，对岩崎昶的思想和意志带来很大的摧残，他在狱中到底受过什么刑罚、吃过什么苦头，当局和他自己从未提及，但显然他在狱中身体是受到很大伤害的，“满映”演员李香兰在传记中提到，她到日本宣传国策电影《白兰之歌》时，幸运地遇到了她景仰的电影批评大家岩崎昶，出狱不久的岩崎当时瘦弱苍白，显然是在狱中吃了苦头。那些“唯物论研究会”发起者的重犯后来在狱中因营养不良、肾脏衰竭、皮肤疥癣等疾病死亡，足以说明监狱环境和待遇的恶劣残酷。1941 年 2 月，即入狱后的翌年，不是发起者只是参与者、不是重犯只是从犯的岩崎昶被释放出狱。不用说，岩崎昶在出狱前也要按照法西斯当局的规定写认罪悔过书、思想矫正转向书。即出狱后不再从事与政府敌对的左翼运动。这是岩崎昶无法言及的内心隐痛和伤痕，这种创伤使他出狱后没有再从事左翼运动，此时日本社会环

境的凶恶恐怖，也没有了从事左翼运动的任何思想与社会基础，左翼运动在日本法西斯的严酷打压下彻底销声匿迹。在此情况下，出狱后的岩崎，面临的唯一问题，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表面思想意志消沉、屈服于当局，但骨子里还没有放弃左翼理想的岩崎，选择了生存下去。但是，如何生存呢？那些自己熟悉的、可以投稿的左翼杂志均不复存在，电影界也没有自己的位置，或者说出于恐惧自保纷纷转向拍摄国策电影的电影公司，轻易不敢，也不愿雇用岩崎。时势维艰、举目无同志的环境，如何生存下去呢？

当此之际，记者出身的日本日活映画公司制片人、1934 年在东京主持设立多摩川制片厂的根岸宽一，此时已经成为“满映”理事。他曾经是岩崎的友人和电影界的同道。根岸宽一是一个宽厚的人，也是对电影充满矢志不渝热情的电影行家。他不顾世态炎凉的环境和时代推荐岩崎，经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的许可，担任满洲映画协会东京支社嘱托，后来辅佐支社长茂木九平，成为次长。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日本著名左翼电影理论家和评论家，岩崎昶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已经出名。起因是中国左翼文豪鲁迅，在紧张的写作战斗之余喜欢看电影作为休息和消遣，但鲁迅对于中国电影界现状尤其是严肃而有理论性的电影批评的缺失深感不满，“上海的日报上，电影的广告每天总有两大张，纷纷然竞夸其演员几万人，费用几百万，‘非常的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空前巨片’”，^②但没有像样严肃的电影批评。经常到内山书店翻看日文书籍的鲁迅，看到了日本《新兴艺术》杂志上连载的岩崎昶的文章《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觉得于自己很有裨益”，“我相信于读者总可以有些贡献”，^③即感到对中国电影界特别是左翼电影理论批评界很有意义，于是在 1930 年 1 月翻译出来并在文末加上“译者附记”，发表于同年 3 月 1 日的左翼文学刊物《萌芽月刊》上，后又收入 1931 年出版的杂文集《二心集》。以鲁迅在当时中国文坛和社会的影响之大，他之对岩崎昶文章的翻译和先在刊物发表，继之结集出版，使岩崎昶其人其文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影坛，一时广为人知。不仅如此，应该说岩崎昶的文章对中国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产生不小的影响。

1935 年，在“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离中日全面战争还有两年之际，岩崎昶应上海著名电影和戏剧家沈西苓的邀请访问上海。沈西苓曾经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结识戏剧家秋田雨雀等人。1924 年，在日本筑地小剧场当实习美工，1928 年回国。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戏剧美术工作，1931 年进入电影界。他曾与鲁迅等人于 1930 年 3 月，联名发起并组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 年 2 月当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领导工作。由于熟悉日语和日本电影界情况，又知道并阅读过鲁迅翻译的岩崎昶的文章，为加强中国左翼戏剧电影界与日本进步电影家的沟通，所以他邀请岩崎昶来上海。在上海期间，沈西苓介绍岩崎昶与上海的著名而活跃的电影界人士结识，如蔡楚生、岳风、史东山、应云卫、田汉、夏衍等。由于鲁迅此前对岩崎昶文章的翻译，所以上海电影界知道岩崎昶的人士非常之多，夏衍、田汉早年也都留学过日本，与沈西苓和鲁迅一样精通日语，所以与岩崎昶的交流具有一种志同道合的通畅。岩崎昶借此了解了中国左翼的、自由主义的各种电影状态，中国电影界人士也借此了解日本电影界的状况，岩崎昶的来访，对中日两国电影特别是左翼电影界的了解沟通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知道自己在大学时代写的不成熟的文章被中国的大文豪鲁迅翻译发表，岩崎昶也倍感荣幸和惶恐，在上海，他到内山完造的书店拜见内山，因为知道内山完造与鲁迅关系要好，是鲁迅极其信任的日本友人，所以提出希望内山完造介

绍自己与鲁迅见面，如果能见到内心敬佩的大文豪鲁迅，是此行的最大收获。内山完造告诉他，由于鲁迅曾经被通缉，上海的白色恐怖很严重，社会形势复杂，鲁迅是轻易不见外国人的。因此，到上海拜见鲁迅的愿望没有实现，这也是岩崎昶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

这样一位在日本知名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左翼电影理论家和批评家，为何在出狱后轻易就加入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张目和宣传的“满映”机构呢？对此，岩崎昶当时和战后鲜有言及，他人也未见有专门研究和阐释。只是在岩崎昶逝世后，日本雅虎网上有位名为“honda”的网友，于 2008 年写下一篇《李香兰和岩崎昶》的文章，忆及自己四十年前（1968 年）在大学课堂上选修岩崎昶的电影史课程时，曾经在课下私自问过岩崎老师，“希望他向我阐明一些关于‘满映’的事情。正因为他在电影史上的诸多功绩，也使我更想知道他是怎么看待那时候自己在‘满映’工作，并支援李香兰拍摄影片等事实的……岩崎昶的态度很诚实，他说他什么也不愿意说。对他而言，那个时候就职时，无非就是把‘满映’看成了一个谋生的手段，而渐渐地，就好像麻木了一样，对‘满映’也不作批判了。他说他再也不想看《莎勇之钟》《万世流芳》《我的莺》什么的了。特别是《莎勇之钟》之流，令他感到很羞耻”。④这段记述说明的是岩崎昶当时只是为了谋生才麻木地违背自己入狱前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而加入“满映”的，毕竟出狱后他要生活，在整个日本都陷入军国主义的战争狂潮，左翼已经没有丝毫存在可能的背景下，谋生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如此。而他对自己当年在“满映”的工作是讳莫如深的，对自己的人生有那样大的转折是感到羞愧的，他之不看“满映”的电影就是证明。

而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除此原因之外，岩崎昶出狱后背叛理想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当时声势曾经如此浩大的日本左翼阵营在法西斯高压下分崩离析深感绝望，自己作为反对当局的电影法的左翼英雄被捕入狱和出狱后，再独自抗拒电影统制法、拍摄左翼电影已经不再可能，而他自己从内心里又不愿意离开电影界，即便是低头屈服的工作与生活，他也愿意在电影圈里厮混，电影已经成为他须臾不可放弃的东西，因此这位曾经的左翼阵营的英雄背弃左翼，加入他曾经看不起的“满映”——那好赖是接纳自己的电影机构；二是出狱后社会恶浊、生活无着之际，根岸宽一的友情和甘粕正彦的不问政治党派和意识形态、唯才是用的豪气和武士气，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江湖义气感动了他，于是加入“满映”并始终对根岸宽一和甘粕正彦充满感恩之情，即便战后他又恢复了左翼电影人的身姿，并为当年在“满映”的工作而讳莫如深之时，他也未对甘粕正彦有微词而是感激之情犹在，始终视为恩人。至于“右翼”的甘粕正彦究竟是什么原因而不顾岩崎昶的左翼电影人、政府电影法反对者和被刑拘者的身份而大胆对岩崎昶委以重任——那可是“满映”在日本本土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均不得而知，但甘粕正彦的如此举措，还是能表明甘粕正彦思想与人性的复杂性。

岩崎昶不仅担任了“满映”的东京支社的要职，而且参与了“满映”的一些影片的策划和拍摄工作。据李香兰回忆，她是在作为“满映”演员出演“满映”与日本东宝电影公司合拍的宣传殖民主义的大陆政策的《白兰之歌》后，到日本宣传电影时认识岩崎昶的：

开拍之前，东宝和“满映”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番宣传。

在虎门的满铁东京分社大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除二位主演外，还有原作者久米正雄、东宝负责人森岩雄（战后任东宝公司副社长）等出席。在那里，我见到了跟“满映”有关系的岩崎昶先生。

听说几天前他刚从拘留所释放出来。岩崎昶先生原是无产阶级电影同盟的委员长，很活跃，被当局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名逮捕、审讯。释放后，他马上进入“满映”东京分社，从事输入德国电影的工作。

这位进步阵营中充满锐气的评论家出狱后，面容憔悴，但仍是个肤色白皙的堂堂男子。他身着和服的样子，颇像个虚无主义者。

我暗自思忖，能成为被这样出色的评论家承认的演员就好了，但因为难为情，没怎么跟他说话。我想岩崎先生一定会对我这个充当发扬国威、进入大陆急先锋的演员，持批判态度吧。^⑤

李香兰崇拜已久的这位曾经大名鼎鼎的左翼电影人，不仅没有批判李香兰，而且成为亲密的朋友。不仅如此，岩崎昶不管是出于逃避现实、麻木、在高压下暂时屈服，还是出于“勉从虎穴暂栖身”的谋生策略，总之他任职“满映”后在从事德国电影的输入同时，也参与了“满映”的国策电影和其他电影的制作。1942年李香兰拍摄的宣传“日中亲善”的国策电影《迎春花》、1943年拍摄的音乐电影《我的莺》，岩崎昶都是制片人并邀请李香兰担任主角。1943年李香兰到台湾拍摄的反映台湾高山族人民生活并支持日军的国策电影《莎勇之钟》，也是岩崎昶担任这部战后他认为“很羞耻”的影片的执行经理兼制片人。与上海中华电影公司合作的电影《万世流芳》拍摄时，岩崎昶担任李香兰顾问而随行。拍摄这部电影，对李香兰而言一是可以借机暂时离开她越来越少回去的“满映”，二是愿意与中华电影公司的川喜多长政合作，三是她“作为中国地方上的‘满映’演员初出茅庐”，“非常憧憬中国电影大舞台——大上海那些走红的女演员们”。^⑥而岩崎昶之所以愿意陪同李香兰到上海参与与中华电影公司的合作，原因也是众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任职于“满映”，李香兰也是“满映”的演员，此时二人已经是朋友，作为“满映”与中华电影公司合作的影片，需要有一位来自“满映”的电影专家参与其中并帮助李香兰，在中国生长并在少女时代所看电影大都来自上海、非常羡慕上海的李香兰，也愿意有一位电影专家帮助自己在上海影坛立足。其次，中华电影公司的川喜多长政与岩崎昶是多年朋友。岩崎昶在就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德文科时代，就开始在《电影旬报》发表许多电影评论，1927年大学毕业时因德文成绩优秀，又熟悉德国电影界情况而受到青睐，被日本的德国电影公司影片进口代理商田口商店录用。就是在该商店，他结识了并非商店员工而是德国电影进口代表，具有超越狭隘日本的一种自由豁达气质的川喜多。从此两人结为好友。田口商店一年后破产，但懂得德语的川喜多和岩崎昶却因为志同道合而频繁来往。创立东和商事公司、专司日本电影国际化的川喜多，抗战爆发以后担任“满映”、汪伪政权和日本国内电影公司出资建立的中华电影公司的掌门人。“满映”与中华电影公司合作的《万世流芳》虽然只有李香兰一个演员参与，但“满映”为了能有与中国大陆上海中心的影坛平起平坐的机会，就让岩崎昶担任代表“满映”的影片计划工作，而这也是川喜多有意设计和安排的。故此，岩崎昶随李香兰到达上海，活跃于上海影坛，直至日本战败。

二

一个马克思主义左翼电影理论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满映”的重要成员，并参与了若干宣传日本和伪满政府国策的电影，这对于岩崎昶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个人经历中难以抹去的污点，正因为如此，战后他才不愿意提及在“满映”的工作和李香兰的关系，为那些所谓宣传侵略国策的电影而感到羞耻。

不过，岩崎昶被迫到“满映”工作后，他的内心真的完全认同他反对过并因此入狱的日本政府的行为和国策吗？恐怕未尽然也。这从他在“满映”参与的影片拍摄的具体情境和若干言行可以得知。上述的“满映”与中华电影公司合作的《万世流芳》拍摄时，岩崎昶陪伴李香兰到上海担任计划和指导的事情，还有一个岩崎昶没有提及、李香兰没有了解的原因：这部表面上迎合日本抗击英美帝国主义国策的影片，揭露的是中国人民抗击英国鸦片毒害的事情。在日本政府和军部方面，这部由“满映”、上海和日本两国三地公司制作的影片，宣传的是他们的主旋律：揭露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罪恶，潜在地为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发动的所谓“解放亚洲”的东亚“圣战”寻找历史与法理的合理性。而在参与拍摄的中国演职人员内心，他们恰恰是要借花献佛、古为今用，借鸦片战争的事情表达反抗一切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声音”和主题。是电影专家并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岩崎昶，以他的智慧、学识和头脑是不能不知道和懂得这一点的，借用时在上海沦陷区写作的作家张爱玲的话说：因为懂得，所以理解；因为理解，所以懂得。岩崎昶作为“满映”代表带着李香兰参与这部影片的拍摄，未必没有“借他人块垒，浇自己酒杯”的潜意识和意识。这样做对他而言是一举两得：既对得起“满映”和自己拿着不菲薪金的工作，对得起李香兰和川喜多的好意，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苦心，借中国人民反抗英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电影叙事，委婉表达自己对电影国策统制，对日本当局政治与思想独裁高压，对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行为的反对心曲。

如果说这是猜测和心理分析，孤证不足以为凭的话，那么岩崎昶参与策划的另一部电影《我的夜莺》，就可以再次表露和证明他的内心的深意。这部音乐电影，表面的主题是符合殖民国策的“五族协和”、日俄一家——这俄指的是白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俄罗斯皇家剧院的歌手随大批白俄流亡满洲，受到小镇日本商社支店长隅田一家的照顾，双方感情甚笃。后来小镇遭遇战争战乱，隅田一家在战乱中失散，隅田在中国各地寻找妻女 15 年而不得。其实此时他妻子病逝，女儿满里子在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做了白俄歌手迪米特里的养女，改名玛丽亚。跟随迪米特里学习声乐。在哈尔滨白俄人的音乐会上，玛丽亚演唱《我的夜莺》一举成名。然而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社会再次陷入动乱。日本占据东北后社会逐渐平静下来，迪米特里却病倒了，靠玛丽亚在夜总会演唱维持一家生机。后来隅田的友人、日本企业家在夜总会发现了玛丽亚，使其与父亲团聚，但父亲却让她继续呆在养父家，以报答养育之恩。玛丽亚后与日本青年画家结婚，迪米特里却在舞台上唱完歌剧《浮士德》最后一个场面后倒地而死。影片结尾是玛丽亚即满里子和生父与丈夫，在养父迪米特里的坟墓上清唱《我的夜莺》，表达哀思并祝愿他在天国幸福。

这部电影表面主题单纯，符合日本殖民主义的主旋律即国策，但实质却是内涵复杂的复调性电影。首先，通过白俄歌手和日本人之间的时代、政治、战争背景下的恩情关系，潜隐地表达了俄国和日本应该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的思想。众所周知，日本和俄国在 1905 年日俄战争后一直处于敌对关系，苏联十月革命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中就有日本政府和军阀的影子，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描写内战的著名小说《毁灭》，写的就是远东苏联游击队与日本军队战斗的故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后，更与苏联利益产生冲突，日本强大的关东军原先最大的作战对象就是苏联，关东军在蒙古诺门坎与苏军的战斗，反映的就是这种日苏争霸的敌对关系。与法西斯德国建立轴心国之后，希特勒德国迫切希望的是日本配合德国“北进”进攻苏联，肢解苏联。太平洋战争

爆发前日本内阁和军部关于“北进”还是“南下”的争论，反映的就是日本军部和政府对进攻苏联还是挑战美国的内部矛盾。虽然最后决定南下太平洋与美军作战，但与苏联的敌对关系没有解除，只是暂时缓解。这样的大背景下，此电影表现的日俄人家休戚与共、没有亲缘胜似亲人的患难之交的关系，对日本的反共反苏国策是一种含蓄的“温柔的”批判。其次，这里的白俄还可作为笼统的欧美人的符号予以解读。日本军国主义以亚洲解放者自居，把与苏美英敌对的战争说成是赶走白人帝国主义，还亚洲人民以自由，太平洋战争就是为了这种“神圣的目的”。而这部影片暗中表现了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不分国别肤色的亲情，特别是与日本人之间的亲情，这对日本战争当局的国策和行为也是一种潜在的颠覆。第三，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后一步步扩大战争规模，把中国、亚洲和英美各国都拖入战争的泥淖，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此片含蓄地把各国人民的苦难与动乱、战争联系起来，家与国家的动荡和命运结合起来，含蓄地表达了战争是苦难渊源的意识，个人家庭不幸的哀婉叙事中暗含对战争和战乱的指责。第四，影片是音乐片，按照李香兰的说法，“拍一部西洋‘敌对性音乐’且色彩如此浓厚的电影，这在当时的日本，是任何一家电影公司都做不到的，而岛津和岩崎却在日本监视所不及的满洲把它拍摄出来了”。^⑦从明治维新以后一度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是亚洲学习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日本之强大的秘密也在这里。但是军国主义主宰日本国家和政治、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后，却把英美西洋作为敌对势力和国家。因此，西洋音乐也是敌对性的了。而这部电影却全部采用西洋音乐电影的形式拍摄一个家国悲欢离合的故事，拍一部纯粹展现西洋歌剧和音乐特长的电影，这种形式本身也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即形式中包蕴着对抗国家愚蠢政策、盲目排斥西方的指责叛逆之意。这样的意思，当时在影片中扮演玛丽亚即满里子的明星演员李香兰，一直未能理解：“在这种紧迫的时局中，岩崎、岛津导演为什么要制作这部具有浓厚艺术色彩的欧式音乐抒情诗呢？是出于自由主义者的抵抗精神吗？即使这么讲，作品内容也过分脱离了现实。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问。”

而这个疑问，直到1986年6月，日本的哈尔滨学院同窗会，在东京安田生命大厅，向一般观众公开放映1984年发现于大阪“行星电影资料馆”的《我的夜莺》后，当年拍片时候的助理导演池田督与李香兰得以再会，才揭开谜底。池田第一次向李香兰述说了拍摄此电影时，有一天晚上在新哈尔滨饭店的一个房间，“岛津导演对池田说：‘这话可不能大声讲呀。’可是他却放开嗓门说：‘日本必将战败。正因为如此，一定要留下好的艺术影片。我们要留下一个证据，当美军占领日本时，让他们看看，日本人不光制作了战争影片，还制作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艺术影片’”。^⑧《我的夜莺》拍摄于1943年，也就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六年，发动袭击珍珠港事变为开端的太平洋战争两年，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宣传舆论还在大肆鼓噪“击溃英美”、大东亚战争大获全胜的谎言，日本大多数国民当时也相信这种谎言，可是岛津导演和岩崎昶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或左翼的电影专家，骨子里的反战反法西斯义人士，却早已看出日本必败的结局，根本不相信政府的鬼话。而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眼光和见识，是与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与他们通过电影了解世界及其大势，与他们战前战中的经历，与他们既懂艺术又懂外语的知识，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他们骨子里不相信和反感日本的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势力，所以他们在提早了解和相信日本必败的事实后，在被迫拍摄一些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国策电影的同时，便想利用电影这一特殊手段拍摄出纯粹艺术片，既要证实日本电影人的实力，实现自己的电影理想，也要为自己和

历史留下他们不是纯粹的为军国主义鼓噪工具的证据。同时，拍摄这样的影片耗时 16 个月，这样长的时间内为此片忙碌，也可以少拍摄些今他们骨子里反感的国策电影。这一点，对于曾经为反对电影统制法（这部法的实质是取消自由主义的和左翼的电影）而坐牢的岩崎昶而言，是内心里肯定存在的想法。因此他才极力要李香兰参加电影的拍摄并担任角色。李香兰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拍摄这样的电影，但因为自己少女时代与白俄少女柳芭一家的关系，跟白俄歌唱家学过声乐，因为信任岩崎昶和岛津导演，所以愉快地参加了电影拍摄。李香兰后来对此回忆道：“我作为‘满映’的明星，在后期即 1942 年以后主演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岩崎的指导下完成的。可能由于岩崎自己没有留下有关他自己和‘满映’关系的记录，他在‘满映’的制作、计划部门大显身手的情况鲜为人知”，“岩崎……始终是我的好参谋，为我出谋划策”。^⑨

正由于此电影包含着太多的说不尽的内涵，所以岛津导演和岩崎等人费尽力气拍出的电影，当时的演员李香兰虽然没有理解，可日本当局却明白了。所以，尽管拍摄前岛津和岩崎昶通过后台——东宝制片主要负责人森岩雄的力量，使得日本当局允许以“满映”的名义摄制，但是摄制完成后却始终未能上演。“满映”拍摄的影片却未能在满洲和日本占领的中国其他地区上映，是由于日本关东军报道部认为这部影片“没有给满洲人观看的启蒙价值和娱乐价值，是部不符合国策的电影”。^⑩在日本国内，作为影片共同制作者的东宝公司，考虑到这部影片不是所谓鼓舞国民士气的影片，难以通过日本内务省依据电影统制法进行的国策电影标准的审查，所以也没有拿出来放映。影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不合时宜，日本当局是敏感地意识到了。日本电影评论家和研究者佐藤忠南在他的《电影与炮声》中对参与电影制作的人员的思想立场有如下的评价：

就我所知，这些人包括原作者大佛次郎在内，是战争期间日本影坛和文坛上的自由主义者。

——岩崎昶作为左翼电影评论家，反对日本电影军国主义文化，一直坚持到最后，被投入监狱。最后，终于刀折弓断，投靠“满映”，谋求生存。

——岛津保次郎被视为喜欢制作可赚钱的商业电影的电影匠，但他始终没有导演过一部歌颂战争的电影。

——大佛次郎发表了历史读物《多列斐斯事件》《布朗基将军的悲剧》，借指责法国军部的错误，暗中批判了日本军部的错误。

除制片人员外，演员黑井洵、进藤英太郎也是自由主义者。（11）

还有一件事情说明岩崎昶对“满映”的态度。那是李香兰在上海拍摄电影时，通过与进步电影人岩崎昶等人的接触和看到中国演员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反感和敌视，这个懵懂的少女逐渐成熟，其间还有与她恋爱的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被国民党政府当作汉奸而刺杀的事情的刺激，使得既热爱中国也热爱自己祖国日本的李香兰，不愿意再以日本人假冒中国人身份欺骗中国人，打算解除与“满映”的合同。为此事她咨询岩崎昶的意见时，岩崎昶同意并鼓励她尽早解除，还说所谓合同之类的东西，签订了就是为了解除，从而打消了李香兰的顾虑。这表明岩崎昶尽管端着“满映”的饭碗，尽管对甘粕正彦怀着感激，但他是清楚地知道“满映”是什么样的机构。而他自己是在被捕出狱后走投无路之际加入“满映”，看来的确是权宜之计，用他自己的话说，加入就是为了离开，或者暂时的加入是为了永久的离开。如前所述，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能够胜利而是必定失败，而具有这样想法的日本左翼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不止岩崎昶，就连中华电影公司的掌门人、岩崎昶的好朋友川喜多，也常常说“中国人没有一

个真正愿意与践踏本国领土的日本人搞日满亲善和日华亲善的”。(12) 在“满映”工作的日本员工中，有这种想法的人，对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反感的人，当然不止岩崎昶一个，但岩崎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三

日本战败、“满映”垮台后，岩崎昶在日本重拾左翼大旗，1947 年担任日本电影社制作局长，主持《日本新闻》的拍摄，制作了《日本的悲剧》《原子弹下的日本》《被占领的一年》等进步的纪录片，岩崎制作、今井正导演的《原子弹下的悲剧》完成后，被美军和日本当局没收，日本的右翼分子在镰仓岩崎昶的住处袭击了他，其左脸颊被暴徒用日本刀划开一条口子。直到 1953 年这部上映时间超过两个小时，以仁科芳雄博士为团长的调查团调查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的纪录片，才得以公映，引起巨大反响。日本电影社在同年八月因经营困难而退社。其后他加入东宝电影公司，1948 年因为领导东宝工会大罢工而离开东宝。

1950 年组织发起日本最早的独立电影公司之一的新星电影社，拍摄了《真空地带》等。新星电影社为独立制片运动及其作品的发行提供了良好的阵地，后来因亏损过多无力支撑而不得不宣告倒闭。此后岩崎昶又先后成立了中央电影社、东京电影社，均因无法同电影界的大公司相抗衡而倒闭。除了拍摄纪录电影和新闻电影，陆续主持发起电影公司之外，岩崎昶在战后愈益“左倾”化和政治化，1949 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先后担任日本民主主义文化联盟评议员、日共临时中央指导部全国指导、中央劳动学院讲师、舞台艺术学院讲师和日本和平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前线组织的日本和平委员会的机关杂志《和平》发表文章，反对当时日本首相吉田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认为那相当于给美国提供 200 万军队，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电影反对和揭露之，进行“思想战”。在电影理论上，他三十年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提出必须以社会的、政治的立场，依据一定的方式分析和指导电影，电影与社会和政治必不可分，在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宣告“从劳动大众的立场期待社会主义的实现，使新闻纪录电影成为推动日本民主化的前卫”。(13) 在进行思想战、理论战的同时，他还和佐佐元十根据德文转译了《苏联蒙太奇》一书，对日本电影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日本进步电影的艰难前进中，岩崎昶始终奋斗不息。在从事实际电影工作、参与政治运动和左翼进步电影批评的同时，他还潜心著述，着力于理论建设工作，写作和出版了《电影与资本主义》《电影的理论》《现代电影艺术》《日本电影史》《现代电影》《被占领的银幕》，译有《好莱坞的内幕》《编剧与电影剧本创作》《电影艺术论》等诸多著作。这些著述对日本电影创作与批评的发展，产生很大很重要的影响，岩崎昶也因此成为日本电影界的理论旗帜和大师级人物。

此外，战后的岩崎还一直关心着中国，关心中国电影的状况，岩崎昶是一位中日电影的友好使者和中国电影的忠实捍卫者与忠告者。1956 年 11 月中旬到 12 月上旬，在日本和中国各自属于东西方冷战成员国，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形下，为了促动中日关系，日本进步势力在全国各个都市进行了“中国电影节”。对中国电影非常关心的岩崎昶，借此机会，认真观看了中国电影并予以坦诚直率的批评。岩崎对通过电影打开中日关系，为邦交正常化实现而展开的电影节予以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中国电影过分政治化、说教化影响了艺术性而感到惋惜。在 1962 年苏联莫斯科电影节，中国展映的电影是《革命家庭》，岩崎一方面指出电影是

社会的镜子，中国的电影表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新面貌的美丽景象，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但艺术上问题不少，对中国从日本到莫斯科电影节送展作品的选择方法提出善意的忠告，提出要用真正的电影语言拍摄电影，思想和时代的准确性一定要与电影艺术结合起来，否则，粗糙的“史前”水平的电影艺术会给电影的正确的内容带来损害和破坏。可惜，岩崎昶的这些对于中国电影的批评，当时的中国电影界没有办法听到，即便听到了也不可能汲取。岩崎昶在二十几岁读大学时代写的关于电影的文章，尚能够被鲁迅这样的大作家翻译推介、予以赞誉，而三十年后历经磨难、在政治和艺术上都进入成熟期的岩崎，他所写的关于电影和中国电影的文章，在中国却没有人注意或听到，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讽和遗憾。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在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日本共产党选择站在苏共一边的情况下，作为日共党员的岩崎昶由于自己的政治和艺术信仰，由于对苏联电影和蒙太奇的热爱，与日本共产党一样选择了倾向于苏联一边，但他内心对中国和中国的电影，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毕竟，他与中国那块土地、人民、文学和电影存在历史的联系和纠葛。

所以，1962 年袁文殊、司徒慧敏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岩崎昶热心地为之安排了日程，介绍日本电影的情况和电影界人士，举办介绍会和座谈会，并全程陪同中国同行的访日旅程，使中国电影代表团深切感受到岩崎对中国和中国电影的友好与热情。三年之后的 1965 年，岩崎昶率领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看了许多中国电影，举行了若干座谈，相互交流各自的经验，还和蔡楚生长时间地交谈了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情况。回国后岩崎在《电影评论》上发表了数篇文章，介绍中国电影。此后不久，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文革”前十七年拍摄的电影都被打倒否定，大批导演和演员被批斗、下放劳动、关进监狱或自杀辞世。中国电影界整整十年与世界失去了联系。当此之际，岩崎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中国、中国电影和那些电影界的老朋友们，他经常阅读中国报纸，查看中国的形势和电影界朋友的消息。1978 年，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电影访日团再度访日，袁文殊等人到达老朋友、日本著名演员高峰秀子家做客时，惊喜地发现罹患疾病、人到老年的岩崎昶早已等候在那里，心脏不好日益瘦削的他关切地询问和打听中国电影界老朋友的消息，关心中国电影的劫难和复苏。他订阅了中国劫后重生的《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杂志，用不很熟练的中文阅读并做记录，非常关心中国电影的消息和发展。他之关心，既是从他一贯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怀抱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使然，也是对他曾经有过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有过与中国电影界千丝万缕联系产生的对中国的感情，所必然导致的心理情结和放不下的惦记。

1981 年，这位从大学时代就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一生从事电影工作，为日本左翼和进步电影奋斗不止的著名电影艺术家，因病逝世。他的曲折磨难、他的中国经历，都像是一部乱世传奇，在中日电影史上留下难以抹去的一章。岩崎昶在战后的日本加入日共，领导罢工，设立独立电影公司拍摄新闻纪录电影，反对日本与美国结盟，继续进行电影理论研究和批评，也一直关心中国的电影事业。但是，对于自己与“满映”的关系、与甘粕正彦的关系，在战后有言论和著述自由、不再有宪兵和思想管制的日本社会，他却始终未写一字陈述或解释。为什么加入“满映”和为什么不做任何辩解，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岩崎自己清楚，他完全可以写文章留文字做解释，当事人自己的解释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可惜他没有这样的文章和解释，这不能不说是又一段“斯芬克斯之谜”，令人遗憾又徒

唤奈何。借用张爱玲的语言表述，就是历史充满太多的传奇和遗憾，说不尽道不完，不说也罢。用周作人的话说，是不说为好，一说便俗。如此，历史的恩恩怨怨陈年旧账，个人与家国的历史，才对后人充满着迷人的色调和无尽的诱惑。那么坚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电影有那样深造诣的曾经高傲的岩崎，战后依然卓尔不群的岩崎，他对自己与“满映”之间的那段沉痛的历史，从内心是难以启齿，是感到一说便俗的，而他一直不愿意成为一个俗气无骨的人，虽然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猖獗的高压年代，他曾经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曾经俗气过和麻木过，那是他心头永恒的阴影和梦魇。

注释：

①日本思想运动研究所编：《掌握宣传机器与电影功能的左翼知能犯——电影评论家岩崎昶》，载同所编撰的《进步的文化人——宣传革命的一百位指导者及其背景》，73 页，日本全貌出版社，1966 年版。

②鲁迅：《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鲁迅全集》第 4 卷，41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

③鲁迅：《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鲁迅全集》第 4 卷，418-41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

④《李香兰的恋人电影和战争论——李香兰和岩崎昶》，<http://d.hate-na.ne.jp/shiho-26/20080616>。

⑤李香兰、藤原作弥：《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92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

⑥李香兰、藤原作弥：《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109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

⑦李香兰、藤原作弥：《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188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

⑧李香兰、藤原作弥：《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192 页、188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

⑨李香兰、藤原作弥：《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203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

⑩根据日本《月刊音乐》编辑西久保三夫的调查，转引自李香兰、藤原作弥：《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191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

(11) 李香兰、藤原作弥：《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189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

(12) 李香兰、藤原作弥：《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203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

(13) 日本思想运动研究所编：《进步的文化人——宣传革命的一百位指导者及其背景》，73 页，日本全貌出版社，1966 年版。

原文出处：《作家》2013 年 10 期第 37~45 页

“满映”與電影的國策思想宣傳

王艳华*

内容提要：“满映”是特殊的国策电影公司，在中日电影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满映”所拍摄的新闻片和故事片都是带有明显宣传色彩的国策片，后期的电影内容则更加反动。“满映”为宣传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国策，鼓吹“日满协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奴化沦陷区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动，成为二战时期日本在国外设置的最大的文化殖民侵略机构。

关键词：满映 满洲国 国策思想 文化宣传 日本

“满映”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警察部门提出和建立的文化机构，是特殊的国策公司，在对被占领区人民进行思想和文化统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中日学者来说，“满映”也是不可缺少的研究课题。然而，战后“满映”这一话题被禁锢了很多年。近几年，中日学者终于从禁锢的状态下走了出来，涌现出一些研究“满映”的学者和电影评论家。日本方面关于“满映”的研究，如 1984 年，原“满映”社员坪井与撰写了《满洲映画协会的回想》，刊登在《电影史研究》第 19 号上，这篇文章可谓是比较系统的“满映”史。接着 1985 年 9 月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写了《电影和炮声》，1997 年，山口猛写了《“满映”——甘粕正彦和活动家群像》等等。中国国内胡昶写的《“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可谓权威的专著。此外还有关于李香兰的研究，李香兰本人和藤原作弥共同撰写了《李香兰：我的半生》等一些著作。但总结和分析这些研究，不难发现不同的文化立场，决定不同的文化层面和研究领域。“满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文化机构？“满映”是怎样利用电影对中国人民进行国策宣传的？在分析整理沉埋于世的资料和梳理研究者论述的同时，从“满映”作品的视角进行分析，揭示日本当局利用电影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的同时，积极进行国策思想宣传。在论述“满映”成立经纬和分析作品的过程中，论证“满映”电影的国策思想的形成、确立和实施情况，进而，探讨“满映”给中国人民心灵及中日电影界带来的影响。

一、“满映”成立与电影的国策宣传思想的形成

1896 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特权。1905 年，日俄战争爆发，最后以沙俄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取得了长春至旅顺的这段铁路，改称“南满铁路”，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从此日本人利用各种手段扩张附属地的范围。其表面伪装经营大连至长春的南满铁路，实际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并为军事侵略服务[1]。1923 年，“满铁”成立弘报系，通过出版杂志、发行报刊、照片、广告等进行极为广泛的宣传，对我国人民进行思想渗透。同年成立“满铁”映画班，为配合日本军事侵略活动，拍摄了一大批纪录片。1931 年日本关东军阴谋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满铁”映画班派人拍摄了事件的经过。为向我国东北人民灌输法西斯思想，日本关东军亲自操纵影片放映。还组成电影放映班，分别到我国东北各地放映影片，介绍日本文化，宣传关东军的武力，鼓噪建立“满洲国”。

* 王艳华，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由此可见，“满铁”较早的从事了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次年成立伪满洲国。“满洲国”建立后，满铁拍摄纪录片的题材更加扩大，但着眼点仍然围绕政治，宣传日满协和，歌颂日本关东军的功德。傀儡政权建立后，不只满铁加强了电影活动，伪满各部也争相购置电影设备，委托“满铁”或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纪录影片。一时间，电影在伪新京成为各类伪满洲国行政机构争相利用的宣传工具。这种各自出击的分散做法，既不利于统一管理，又分散和浪费了资金，特别是不利于关东军对电影的统治。此外，“满洲国”建立后，大部分满洲人看的电影都是国内的上海电影和美国电影，有一部分电影有反日思想。为了阻止反日电影对满洲人的影响，也为了从思想上对满洲人民进行殖民统治，并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把“满洲国”宣扬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建国精神”传播给广大满洲人民[2]，建立电影统治机构已势在必行。“满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建立起来的。

1933年，日本关东军参谋小林少佐最早提出在“满洲国”建立电影统治机构的设想。当时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主管的“全日本电影教育研究会”来伪满召开“电影教育讲习会”，提出了“满洲国文化之向上由电影起”的主张，目的是通过电影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扬日本侵略有“理”的谬论。小林少佐由此提出建立“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得到关东军和伪满警察部门的支持。受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控制的该研究会经过三年的酝酿，于1936年7月提出了“满洲国电影树立案”。1936年底，建立满洲电影统治机构的方案已经具体化，1937年8月2日，由伪满洲国国务院通过了“电影国策案”，决定投资500万元，由伪满洲国和“满铁”各出资一半，设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从满洲国电影树立案的议案全文不难看出建立“满映”的真正目的。设立的部分理由如下：

1. 目前几乎没有一部电影适宜与指导教化满洲国民的。

2. 目前满洲国内上映最多的影片为美国、上海以及日本的影片。这些影片有许多是不利于满洲国的治安工作以及国民思想教育的。对此，有必要加以迅速制止。

于是，“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于1937年8月21日正式宣布成立，简称“满映”。它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文化统治机构，直属满洲国国务院，实际由关东军控制。该公司垄断了伪满的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权。

从“满映”筹建的全过程看，“满映”的思想就是日本关东军和伪警察为巩固其殖民统治对东北沦陷区人民进行殖民教育的国策教育思想，他们建立电影机构的基本出发点，主要不是想通过电影给民众以娱乐，而是利用电影这种易于为民众所接受的形式，向民众灌输殖民主义思想；他们不是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理解，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来利用；他们不是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建设来兴办，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强化统治的手段来加强。从“满映”所肩负的使命不难看出国策电影思想的形成。

“满映”一经成立，就成为伪满洲国的一个特殊的国策会社。所谓“国策公司”，就是依照日本政府规定的法律创立，执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并导入政府的资金。在伪满的各大会社中，“满映”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特殊地位是由它担负的使命决定的。“满映”的特殊使命，就是执行国策电影。引用“满映”的一份文件解释说：

“满洲映画协会是满洲国的国策会社，根据日满一德一心的正义，本着东亚和平思想的真精神，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对于满洲国的精神建国，具有重大的责

任，对于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应当将满洲国的实在情形，充分介绍，使他们十分的认识，而且对于其他满洲国内一般文化的向上，贡献材料。到了一旦有事的时候呢？它的责任就更大了，就是与日本达成一气，借着电影这个东西，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

这份文件精辟的道出了“满映”的真正历史使命。

“满映”作为一个特殊的国策电影公司，具有电影输出、输入、电影制作和电影发行、放映等多种职能，从建立开始就积极拍片。“满映”的影片分为娱民电影、启民电影和时事电影。即故事片、新闻片和纪录片，也有少量教育片。其中有“满映”独立完成的，也有同日本东宝、松竹等电影公司合作的影片，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和回顾“满映”的一些作品，来探讨“满映”对满洲乃至中国沦陷区人民进行的国策宣传和殖民文化统治。通过“满映”建立经纬的论述，阐明“满映”和关东军的密切联系，也看到了国策电影思想的形成。

二、甘粕正彦与“满映”电影的国策宣传思想的确立

谈及“满映”这个话题离不开理事长甘粕正彦，通过他的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当局在进行国策宣传上的良苦用心。“满映”刚成立时期的理事长为川岛芳子的哥哥金壁东，但实权掌握在原满铁庶务课长林显藏手里。后来因经营的问题，1939年，“满映”新办公楼落成之际，甘粕正彦经伪满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和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处长武藤富男的推荐，出任了“满映”第二任理事长。这是“满映”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

甘粕正彦 1891 年 1 月 26 日生于日本宫城县仙台市北三番街的一个士族家庭，父亲春吉是仙台市警部的警官，甘粕正彦是长子，在家中占有重要地位。1905 年入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学习，1910 年转入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在这里他受到了教官（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和战犯）东条英机的教育。1922 年当上了东京涉谷宪兵分队长。同年 8 月，以大尉军衔担任了东京鞠町宪兵分队长。同年 9 月 1 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在大地震的灾害中，甘粕正彦乘机杀死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衫荣和他的妻子伊藤野枝及大衫的外甥。同年 12 月 8 日，军法会议判处甘粕有期徒刑 10 年，但甘粕仅服刑两年零 10 个月，于 1926 年提前保释出狱。出狱后甘粕到欧洲旅行，途经中国时，在沈阳会见了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源贤二大佐，后同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搭上关系。这时日本关东军正阴谋策划对我国的更大规模的侵略，甘粕同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成为策划入侵我国的急先锋。之后，甘粕参加“九一八”事变的蓄谋等一系列活动，得到日本关东军的称赞，也奠定了他以后和关东军密切接触的基础。此后，甘粕也参加了日本关东军密谋挟持溥仪的活动，亲自押送溥仪到长春。由于甘粕深得关东军的信任，所以他也参与了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活动。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后，甘粕出任了伪满民政部警务司司长，成为伪满警察的最高头目。1937 年调任伪协和会总务部长兼规划部长。1939 年经伪满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和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处长武藤富男的推荐，甘粕出任了“满映”第二任理事长。甘粕一到任给人以不同的印象，作为伪满洲国的特殊公司，“满映”一直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部门所操纵的，对于这样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单位，由甘粕出任理事长，说明了甘粕正彦同军警部门的特殊关系。因此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在满洲，白天的关东军，晚间的甘粕”。当时，满洲最大的电影杂志《电影画报》第三卷第三期三月号，庆祝满洲“建国”10 周年卷上，甘粕正彦发表一篇题为《战事和电影》的文章，明确说明了“满映”国策宣传的历史使命。部分原文如下：

“电影在平时，固然是一种国民的心粮，陶冶情操纯化思想，以致力于娱乐的魅力为主体，但是在战时，由于巧妙的操纵它的写实效果，由于认它做宣传报道的宠儿而使之充分的活跃去宣传国家的威力，把实象比文字比绘画更深刻的传达给国民，籍使前线 and 枪后相结合，电影是负着使国民全般协力的觉悟和爱国的观念旺盛的任务的……”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一个警察头目操纵的文化部门，是怎样的国策宣传公司了。日本就是利用大众易于接受的传媒工具——电影，对满洲人民进行国策和思想文化宣传的。从理事长甘粕正彦及其活动中，可以看到国策电影思想的完全确立。

三、“满映”电影的国策宣传思想的实施

“满映”建立后，为了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早日出片，很快健全了内部机构，扩充了人员，还增加了电影专业人员。根岸宽一、牧野满男、谷川信吾，都是有影响的电影人物。由于“满映”是国策公司，所以一开始就把这种精神强烈的表现出来了。“满映”的第一部作品是《壮志冲天》，1938年由坪井与导演，讲述的是农村模范青年刘得功，常遭土匪侵袭，投奔了伪满洲国军，决心讨伐匪首马得堂。他的这个行动受到年迈的父母和叔父的反对，但却得到未婚妻瑞坤的支持。刘参军后，很快晋升为伍长，在一次讨匪中同匪首马得堂遭遇，刘负伤，经国防妇人会的妇女热心看护，伤愈出院，回乡同老母恋人团聚，受到全村人的欢迎。影片极力美化伪满国军的生活，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影片制作的目的是宣传伪满国军，而且影片是由治安部委托摄制的，强烈的说明了电影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需要的产物。在谈及第一部电影时坪井与导演承认“这是一部强烈宣传国军为内容的影片，剧场效果不佳，只能起到一定的宣抚作用。”除了美化伪满国军的影片以外，还拍摄了歌颂伪满警察的影片。如1938年拍摄的《大陆长虹》就是典型的讴歌伪满警察的影片，夸大了伪满警察的形象。“满映”拍摄的都是这样赤裸裸的宣传国策和教化满洲人民的影片。“满映”前期拍摄的都是这样的影片，比如《国法无私》、《烟鬼》、《田园风光》等。1938年，唯一的日本演员李香兰的加入，备受注目，因为她用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她出演温柔的爱情影片较多，是日本当局用温柔的爱情故事吸引满洲人民，用意自然是教化民众、宣传国策思想及大东亚共荣思想。以李香兰的名字进行演艺活动的是日本演员山口淑子，1920年生于中国，在上学期期间，她曾向白俄声乐教授勃多列索夫夫人学习声乐，并曾专门去北平上中学，学习标准汉语。1933年，作为日本侵略者鼓吹所谓“五族协和”“日满亲善”的虚伪政治口号以麻醉中国人民而进行的宣传活动之一，奉天广播电台开办了一个名为“满洲新歌曲”的节目，经日本北支派遣军司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陆军少佐山家亨介绍，刚刚在勃多列索夫夫人的独唱会上演唱过歌曲的山口淑子被他们选中，成为演唱满洲新歌曲的歌手。为了避免中国观众的反感，电台当局提出不用她的日本名字，而用中国名字李香兰。出于同样的背景，当“满映”筹备拍摄《蜜月快车》时，为了寻找在影片里唱歌的女主角新娘的扮演者，经过关东军报导部的军官推荐，正在北平读中学的山口淑子再次入选。同样出于给满洲人看的电影的决策，李香兰再次被选为她的艺名，从此，李香兰的名字开始出现在银幕上，直到日本战败。李香兰主演的第一部影片是《蜜月快车》。影片主要是表现新婚夫妇刚结合时的矜持、喜悦的心情，是一部闹剧性质的影片，实际效果不佳，却使李香兰被人们所熟知。此后，李香兰频频扮演中国少女的角色，吸引中国人民的眼球。如《蜜月快车》、《富贵春梦》、《冤魂复仇》、《铁血慧心》、《黄河》等。在扮演许多纯真的中国

少女之后，“满映”开始利用李香兰扮演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中国女子形象，且都十分的爱恋日本男子的角色。第一次“满映”和东宝合作的影片是《东游记》，描写满洲国农民去东京找他们的一位去日本多年的朋友的经历。在这部充满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强烈藐视和歧视的影片里，两个前去访友的中国农民在旅途中出尽了洋相，他们的朋友老王虚荣自私、吹牛撒谎，而与此相比，日本国是那么的先进富裕，日本人是那么的彬彬有礼。李香兰扮演的丽琴，是日本一家公司的打字员，她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所以成了两个农民和日本人交流的媒介，她与一名中国留日学生相爱，最后动员大家一起回去，建设“新满洲”。在和松竹合作的《迎春花》中，李香兰扮演的白丽，同样是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与来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关系密切，千方百计的帮助他与中国青年建立联系，在这两个角色身上，形象地体现了日本侵略者所鼓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和“五族协和”的反动口号所需要的中国人和中国妇女的形象[3]。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向内地的推进，随着李香兰名声日隆，“满映”又与东宝合作，推出“大陆三部曲”进行电影的国策宣传。所谓的“大陆三部曲”，就是指李香兰和东宝名演员长谷川一夫共同主演的《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

《白兰之歌》是 1939 年“满映”协助日本东宝公司拍摄的一部宣传“日满协和”的影片。影片描写一名“满铁”工作的日本青年技师，爱上了中国农村姑娘雪香，雪香的伯父是抗日运动的指导者，反对这桩婚事，两人的爱情经历了曲折，雪香仍爱着日本青年，并帮助日本青年运送子弹和抗日人士对射，战斗中，雪香和日本青年都中弹受伤，两人最后死在一起。尤其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几个场面。男主人公听从其父临终遗言，来满洲发展，兄弟三人一起来满洲建设，其中有句男青年弟弟在父亲灵前的台词：“请父亲放心，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一定成为优秀的满洲开拓者”（笔者译），这是典型的殖民宣传，把满洲当成了日本自己的国家，影片把日本青年描写成是怀着把“满洲国”建成理想国家的献身精神而努力工作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在影片里，自卫开拓村的人们早晨举行升旗仪式并对皇居遥拜，对国旗行注目礼，从这些点点细节可以看出日本当局对中国民众进行奴化和思想渗透。影片中表面上讲述的是温情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宣传的完全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国策思想与殖民主义精神。

《支那之夜》讲述的是一个极其憎恨日本人的战争孤儿，被男主人公的诚实和浪漫的爱所感动，最终爱上这个日本船员并嫁给他成为日本船员妻子的故事。影片比较细致的描述了中国女子爱日本船员的内心发展过程。在战前，日本男子殴打女子是一种爱的表达，被打女子对那男子的强烈的爱所感动，会心怀感激，这是典型的日本传统习俗和文化，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莫大的侮辱。影片里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场面，从中不难看出这部影片向满洲人民灌输殖民思想，渗透日本文化的动机。日本电影人用日本人山口淑子（李香兰）制造出日本人被中国人挚爱的幻想，愿为了维持这个幻想，一直把持着不公开李香兰身份的秘密，导致李香兰用中国人的名字演中国人的角色，扮演一个深爱日本男子的纯情中国少女，是典型的“日满一心”“五族协和”的国策宣传片。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和军界经常宣扬“八弘一字”“大东亚共荣圈”，只用口号很难被人们接受，所以《支那之夜》很好的用温和的爱情故事体现了“共存共荣”的方针，可见日本在进行国策宣传上的良苦用心。

《热砂的誓言》描述的男主人公是继承兄长的遗愿来满洲在“满铁”工作的日本青年，女主人公是来往于日本和满洲学习音乐的中国北京公司社长的女儿，叫芳梅。这个影片也是中国女子爱日本青年的故事，是更加典型的国策影片，反

映了日本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奴化和殖民教育方面的赤裸裸性。归纳分析这三部影片，都是男主人公是日本人，女主人公是中国人，在当时男尊女卑的思想里，男人是主导者，女人是奉献者，整个身心的奉献者，长谷川一夫的角色代表日本，李香兰的角色代表中国，表现出中国如此信赖和依托日本，日本是一定爱中国的。这三部曲是典型的国策宣传片，是侵略中国现实的隐瞒，李香兰所演的是从内心里那么挚爱日本男子的纯情可怜的中国女子形象，日本电影人及其统治机构，费尽心机的利用电影这个大众宣传手段为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扩张，大肆进行宣传国策。

“满映”作为特殊的国策公司，从1937年建立到1945年满洲国崩溃的八年时间里，在纪录片方面初期（1938-1939）拍摄60部，中期（1940-1942）拍摄110部，后期（1943-1945）拍摄19部，新闻片有《“满映”通讯》312号，《“满映”时报》313号，编辑发行《满洲儿童》55号。故事片共计108部，“大陆三部曲”属于故事片。“满映”的纪录片都是纪录伪满洲国的重大政治活动，对满洲内部起到了“建国精神的普及”，对外“介绍满洲国的实在情形”“介绍、输入日本文化”，最露骨的体现了国策电影的思想。

“满映”所拍摄的新闻片和故事片都是带有明显宣传色彩的国策片。后期的电影内容更加反动，有的恶意攻击共产党、有的美化伪满警察、有的直接反映了日本在南太平洋的侵略活动。“满映”为宣传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国策、鼓吹“日满协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奴化中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动，成了二战时期日本在国外设置的最大的文化侵略机构。“满映”在国策宣传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奴化的过程中，是赤裸裸的宣传和奴化，对中国人民是一种心灵的摧残。在日中15年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让后世的中国人永远铭记。（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2008年02期第105~109页）

【参考文献】

- [1] 孙立祥. 日本右翼势力论纲[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6.
- [2] 吕秀一. 简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J]. 东疆学刊，2006(3):48.
- [3] 徐志成，刘宁. 日本人的“中国观”[J]. 东疆学刊，2008(1):52. ^NU1

资料来源：人大资料中心

滿鐵檔案鐵証：砸向“拜鬼”者安倍的一記重錘

——遼寧省檔案館館長趙煥林就公布部分滿鐵檔案答本報記者問

本報記者 馮 喆

記者：趙館長，今天參加檔案公布會的中外媒體有近 30 家，其中有新華社等國內媒體，也有路透社、日本《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國外媒體，請您談談這次公布這 3 份檔案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趙煥林：去年 12 月 26 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悍然參拜供奉有 14 名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粗暴踐踏了中國和其他亞洲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此舉實質是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和殖民統治歷史，妄圖顛覆國際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正義審判，挑戰二戰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日本領導人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對日本未來發展走向的高度警惕和擔憂。眾所周知，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災難。然而幾十年後的今天，少數日本右翼分子卻一再恣意歪曲歷史，否認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實，說南京大屠殺是不存在的，受害人數是虛構的等等。遼寧省檔案館館藏 6 萬多卷（冊）南滿鐵路檔案資料，這些檔案資料就出自日本人之手，例如當年日本侵華機關——南京特務班親筆寫下的參加日軍南京大屠殺的証詞。這些檔案記載了日軍侵佔南京後的一些活動情況，雖然沒有也不可能直接描述日軍慘絕人寰的屠殺行徑，但透過字里行間，從一個側面真實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實施大屠殺的罪惡行徑。這是一份日本侵略者的自供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無可辯駁的確鑿證據。關於滿鐵檔案，我們首次公布是在 1994 年，時任日本法務相大臣發表了“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否認日軍戰爭罪行的言論。遼寧省檔案館公布了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檔案，引起了社會廣泛而強烈的反響；第二次公布相關檔案，即南京特務班的 3 份極密報告書，是在 2000 年 2 月 29 日，遼寧省檔案館將這些檔案複製件呈現在由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共同在京舉行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見証報告會上，聲援東史郎——一位以親身經歷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丑惡行徑、具有正義感的日本老兵，通過中央媒體向全世界報道，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反響。今天，再次公布這 3 份出自當年參加南京大屠殺慘案的南京特務機關之手的鐵証，就是要告訴世人歷史是不容篡改的。日本右翼分子要正視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歷史真相，謊言難掩真理。同時，希望人們可以以檔為証，希望日本政府以史為鑒。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思潮，每個中國人、所有遭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和日本國內愛好和平的人們都要高度警惕、堅決抵制。

記者：我們知道，滿鐵是日俄戰爭後日本設在我國東北的“殖民會社”，是一個

地地道道的长期侵华机构，那么它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有哪些罪恶行径？这 3 份报告书主要反映了南京大屠杀中的哪些情况？

赵焕林：日俄战争后，中国东北被日本占领，原来由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被转让给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曾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即以公司的名义实行殖民侵略，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1907 年 4 月，满铁在大连正式开业，除了拥有铁路之外，还在铁路两侧拥有 16.7 米至 3000 米不等的满铁附属地，附属地总面积达 482.9 平方公里。由于日本取得每 10 公里可驻兵 15 名的权利，因此，南满铁路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据点，先后由关东都督，关东长官、驻满洲国大使，对满洲事务局负责。满铁在中国存活了近 40 年，它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主要从事铁路、煤矿及调查情报工作，与日本关东军、关东州总督府组成了在中国东北的“三巨头”，积极谋划对中国的侵略，并利用经营铁路、煤矿等掠夺中国资源积累资金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据档案记载，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2 年，满铁利用掠夺中国资源的积累，共向侵华日军提供军费 1100 万日元，而日军占领的铁路、矿山、工厂则无条件地送给满铁。满铁在各方面给予日军最好的后勤保障，可以说遇河架桥、逢山开道，同时向日军提供整个东北的第一手资料，使得在“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利用铁路大动脉，不几日就占领了整个东北。而后日军向中国华北伸手，“七七事变”是必然的。从馆藏档案我们可以看到，从 1932 年到 1936 年间，满铁派员组成支那驻屯军乙嘱托班，人数不等，随时派遣到中国华北地区搞调查，4 年时间里，他们将华北地区有多少城市、多少村庄，甚至村庄中有多少人口、多少水井、多少条小路、多少棵树及大致位置等等，摸查得清清楚楚。根据馆藏“七七事变”电报档案记载，满铁印刷并向侵华日军提供华北地图 5000 张，下发到日军曹长，日军入侵华北则按图索骥。日军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到处都有满铁积极参与的身影，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军得到满铁 3000 多万日元的军费支援，可以说满铁是日本侵华的最大罪魁。满铁活动中形成的大量档案记载了日军侵略中国的史实，我们从中拿出任何一件都是揭露其罪行的确凿证据。根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满铁档案记载：“七七事变”后满铁成立了“北支事务局”，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接管铁路、参与管理被占领区事务。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满铁上海事务所立即组成“南京特务机关”（也叫南京特务班），进驻南京，协助日军侵占活动。再次公布的南京特务班从 12 月 22 日至 1938 年 3 月的 3 份报告书，当时被列为极密文件，16 开纸，打字油印。满铁南京特务班第一份报告形成于 1938 年 1 月 21 日，报告了日军侵占南京后的“治安”、难民、伪自治委员会的设立、交通恢复、日人街组建和国际社会反映等；第二份报告形成于 1938 年 2 月底，报告了伪自治委员会活动、遣散难民、对抗日人员镇压、街市清扫管理、尸体埋藏以及物资供应等情况；第三份报告形成于 1938 年 3 月底，报告了此前伪自治委员会活动、解散难民区、镇压抗日人员、发放“良民证”以及清除尸体等情况。显然这些工作

报告，主要是为了表现日军和特务班的“工作成绩”，不可能提及日军占领南京后兽行，更不可能直接记述大屠杀的场面，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南京大屠杀的概貌。

记者：我们看到，这次公布的馆藏档案还包括安倍晋三外公岸信介在满铁任职的部分相关文件，这部分档案对我们了解安倍晋三有什么帮助吗？

赵焕林：我们公布的主要是岸信介 1936 年至 1939 年 10 月在伪满洲国任职的相关档案。根据档案我们了解，岸信介是作为义子过继给了加藤，叫加藤介，加藤是个大家族。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发迹。1936 年，岸信介到中国东北，最初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等职，最后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他实际代表着日本政府，控制着伪满洲国的经济，当时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是星野直树，他代表着日本军方。1939 年 10 月，岸信介回到日本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处长。在中国东北近 4 年的时间，他是隐藏在背后的伪满洲国经济的实际掌控者。1957 年 2 月，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后极力反华，是战后首开敌视新中国先河的人物。作为岸信介外孙的安倍之所以赴靖国神社“拜鬼”，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

记者：您是学历史出身，有着 30 多年在档案馆工作的经历与经验，特别是对馆藏历史档案有深入研读，辽宁省档案馆几次公布日军侵华档案，您都是亲历与组织者，对于历史档案的凭证作用以及今后对历史档案的研究您有哪些认识与建议？

赵焕林：档案的最本质特征是原始记录性，档案的基本职能就是凭证与信息作用，档案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还原历史真实。历史档案对保护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认为现在，特别是年轻的档案工作者，在保管好档案的同时要重视深入研究，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同时，要研究世界文化，不能只研究一地文化，要拓宽视野，从档案中研究世界各地的民俗、饮食等各方面文化。我们的档案馆应该注重搭建合理的历史档案研究平台，既不泄密，又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注重培养一批真正的档案专家、学者。由国家提出几个历史档案研究课题，组织、凝聚一批历史档案学者，踏踏实实一个一个历史问题去研究。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开辟未来。

资料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4 年 1 月 27 日 第 001 版

夏目漱石的大連五日行

清流一叶

手里有一本书，是一本民间组织的出版物。题目是〈大連を予見した漱石〉，作者是一位曾在大连生活多年的日本人。漱石是指日本的大文豪夏目漱石，一个大文豪的名字能与大连相联，禁不住心生自豪。

喜欢读书的人崇拜文豪，文豪走过的地方，总会留下文字。夏目漱石为什么来到了大连？

夏目漱石来连的经纬在他后来的新闻连载《滿韓ところところ》中有描写：
(大意——清流一叶译)

我一本正经地问中村总裁，满铁会社到底是干什么的？总裁目瞪口呆，说我够傻的了。听他骂我傻，我也没在意。于是他笑着说，等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海外的日本人在做些什么，应该亲眼看看。像你这样无知傲慢的人的言行，只能给我们添乱子。——我跟他讲，只要你陪着我，到哪儿都可以。

当时夏目漱石在大阪的《朝日新闻》社担当文艺栏的编辑，虽然看不到新闻社与满铁的交涉，但可以推测满铁总裁对夏目漱石的邀请，不仅出于老交情，更主要的是用夏目漱石的文字来扩大满铁在满洲立足的影响，满铁自开设以来就很重视舆论和宣传。

夏目漱石的满洲之行始于明治 42 年（1909 年）9 月 2 日，他在神户乘坐《铁岭丸》出发，9 月 6 日午后 5 时，抵达大连港。来接他的是总裁的秘书，他们乘马车来到了总裁公馆。提到马车，他在文中说，以前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人不想把马车转让给日本人，就深埋在地下。后来被找到，挖掘出很多，经过修理又重新使用，虽然不那么干净。但是秘书安排的马车很威风，即使在东京的中心街也很难看到这么漂亮的马车。

进到公馆内，他被里面的宽敞宏大所压倒，虽然不知道房间的数量，但形状像一个细长的寺院大堂。整个地面铺着地毯，隔着距离摆放着两套接客的沙发和桌椅等。天棚很高，俯瞰着一楼和二楼，从二楼的长廊可以看到一楼的大厅，听说一楼的大厅还用来做舞厅。

夏目漱石没有告诉总裁出发的时间，所以到达大连后也不知道总裁的去向。秘书把他带到了旧满铁宾馆，他经历了三天的船旅之后，总算吃上了陆上的美餐，并与身边的英国人愉快谈笑，似乎忘记了出发之前的胃痛和旅行的疲累。

他走出宾馆的正门，眺望着远处的大连市街，深深吸了一口气，心情也沉稳下来。槐树的落叶伴随着明朗的寒夜的空气轻轻落地，远处传来行人疾行的脚步声。黑暗处，身着白衣的西洋人乘坐的马车缓缓驶来。

重新回到总裁公馆，总裁和国泽副总裁在那里谈论工作。谈话的内容之一是关于安奉铁路线路的铺设，二是关于在星个浦一带建立观光地设施的计划。这个观光地包括宾馆，高尔夫球场，观光游路，海水浴场和野外疗养地等。夏目漱石听了很感慨，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也没有过这种设想。从他们的谈话中，感到了总裁的气魄与自信。谈话后，总裁对他说，时间晚了些，带你到俱乐部去看看。

过了日本桥，就看到了一个纯欧式的，只有在欧洲城市的中心才能看到的高

雅而厚重的建筑物。这里是社交场所，会员制，各种设备很充实。他被送回宾馆时，时钟敲响了，深夜 12 点。

第二天清晨，总裁就来到了宾馆，亲自当向导带他游览大连。初秋的大连是最惬意的季节，夏目漱石在文中写道：我站在宾馆的石阶上，这里一直通向日本桥，我眺望着着宽阔的往来道路。大连的阳光比日本的阳光更明亮地照耀在面前。太阳看似遥远，光芒却在近前。不知该怎样评价这清澈透明的空气，街道，树木，屋顶，砖瓦，光彩与异色都浮现在我眼前。——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轻悠悠地晃动着身子，渡过日本桥，向西走去。

远处的山丘上，矗立着一个尖头碑，后面是两栋白色的建筑，都是钝型的红色屋顶。尖头碑的前面有一座漂亮的小桥。小桥，白色建筑和尖头碑都是白色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里就是电气游园，在日本内地都找不到这种具有特色的游园。

夏目漱石没有进到园内，因为正式开园是在 10 月底。

马车走近电车道旁时，夏目发现车道的铁轨的铺设方法与日本不同。日本的铁轨是用石子铺底，然后埋起来，而这里的枕木部分是埋在地底下的。总裁解释说这是最新式铺设法，并直言说道，这里的事都交给了技术人员，相信他们的能力。如果在日本国内就办不到了，吹毛求疵的干涉的人太多了。

来到了伏见台，这里正处在建筑和道路的建设中，黄土飞扬的地方将会出现一条主干道路，和宾馆前的那条大路一样。他被带到了中央试验场（后称实验所），参观了精制豆油和肥皂的场所，还进了蚕丝和精制高粱酒的地方。试验场创建只有两三年，但已有成就。

这一天的午餐设在了满铁本社，河村调查科长为他制作了满铁视察计划大纲。总裁的指令是，让他尽量多看一些，尤其是与满铁有关的工厂和地方，并且找了一个最合适的向导股野义郎，此人曾是他的学生，甚至风传此学生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作《吾輩は猫である》中主人公的原型。

午餐的时候，夏目胃病复发，回到了宾馆休息，晚上的招待舞会也拒绝了。

第三天以后的大连之行都是由股野义郎相伴的，经过和去过的地方有北公园，川崎造船所（没有去船坞，只在办公楼向外遥望）。接着去了发电所，《铁岭丸》驶入大连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发电所的，称谓东洋第一的高大红色的大烟囱。

达里尼时代的电机作业所和发电所都设在滨町，日殖时期满铁在吾妻桥设置了新的电气作业所。电车的开通，电气公园的建立，电气的力量为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带来了希望和活力。

夏目漱石被带到了三泰油房，在那里的感动和震动被表述在以下的文字中：（下面翻译的这段，我以前曾在博文中《夏目漱石和大连》中发表过）

上到三楼一看，到处是大豆。只有靠窗的一边留着一点儿可以走一个人的地方。我在大豆和墙壁之间转来转去走着。如果不小心，既怕脚底把大豆踩碎，也不愿意听到没有人的天棚顶处回响着无意义的响声。大豆像沙堆一样在脚下起伏着。

从这头望到那头，绵延起伏的大豆的山脉持续着。在这中间有三处，有着井字形的通孔。大豆不断从那里流下去，像是压成扁平状。有时听到哗的一声，三楼的某处又堆起了新的大豆的沙堆。这是苦力们扛着大豆麻袋，在适当的地方，打开口袋把大豆撒在地面上。这时，一股呛人的烟雾升起，数不尽的潜伏在大豆之间的灰尘顿时跳跃起来。

苦力们规规矩矩，体格结实，有力气，也很能干。如果只是去看看光景，给人的印象挺好。他们背上扛的大豆袋子，好像不比米袋子轻。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背着大豆袋子，缓慢地来到这里的三楼。倒空了一袋又一袋。不知一共有多少人接连不断地来到这里，从来都是同一个步调，同样的态度，相同的时间，甚至连间隔时间几乎都相同。人走的地方用长长的厚板铺成坡道，从楼下到三楼，设置的像建筑工地的脚手架。

他们从坡道的一边上来，又从坡道的另一侧下去。上来的人和下去的人在坡道的途中左右对面时，也很少搭话。他们就像一群没有舌头的人，默默地从早到晚，持续着扛着这些沉重的大豆袋子，上到三楼，再从三楼下去。那种沉默，那种机械性的运动，那种忍耐和精力，几乎是一种命运的反射。实地站在那里观察着他们，慢慢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想法。

不管三楼撒下的大豆是否落下，下面用一个大麻袋铺在地上接着。然后立即运到大锅的地方，在锅里煮豆的时间很快。刚放进去不久，就拿出来。拿出来时，抓着像包袱似的麻袋的四角，把还冒着热气的大豆抛到地上。赤铜色的皮肤在烟雾中，被汗水浸透闪着亮光，看起来很勇猛。

看着这些赤身的苦力，突然想起韩楚之战的故事。过去韩信等就是这样一群能忍辱负重的豪杰吧。他们的腰部以上的肌肉结结实实地裸露着，脚上穿着用牛皮缝制成的硬靴子。蒸好的大豆用灯心草圈着，用圆木框从上面将草穿起来。到了两尺高的时候，苦力们立即穿着靴子钻进框子里，用脚不断地踩豆子。然后把豆子塞进螺旋状的绞杠里，推着把手转圈子。碾出的油滴顺着地下的沟里粘乎乎地流着。豆子成了豆渣，这个全过程不过 2、3 分钟。

这些油被空吸泵抽进一个特大的铁桶里，静静地深深地沉淀下去。从二楼往下看了三、四遍，竟感到十分恐怖。我问带我参观的人，没有发生过从这里掉下去摔死人的事吗？他听了后，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道，“很少有那种事情发生。”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会掉下去。

苦力们真的很勤劳，而且很安分。我走出楼外，怀着感叹的心情。陪我参观的人说，日本人真的比不上他们。那样干，一天只靠 5、6 钱在生活着。为什么能顶得住，真是难以理解。听了他的话，我反而感到无言以对。

夏目漱石去的另一个地方，以前曾经是陆军医院，后来被称为鬼怪宅。他不清楚为什么给起了这个吓人的名字，但却没时间和心情探问。他从一楼到三楼的长廊中走了几个来回，地板一直发出嗞嗞的响声，上楼时的声音更大。楼梯是铁制的。走廊的左右是一排排房间，门上挂着居住者的标牌。

他在大连期间想搬到股野家去，却被总裁挡住了，但他坚持要去看看满铁社员的住宅，于是来到了满铁中级社员宿舍。这是在山坡上建起的社宅，从坡下往上望去，就像到了英国的避暑地。外部是欧式风格，里面有榻榻米房间。从这里可看到大连的中心市街，而且背靠山峦。

他很想看看中国人的旅馆的样子，于是被带到了—一个地方，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合开的一个大豆商店。虽然不是旅馆，但却给从远地来的货主提供住处。进了里屋，看到几个人在那里抽着烟，打着麻将；也有在房间里谈生意的，样子很悠闲，看不出商谈时的焦躁和狡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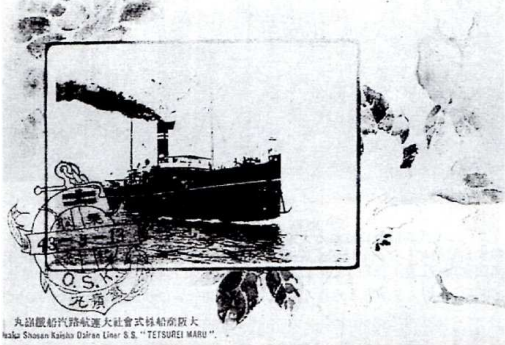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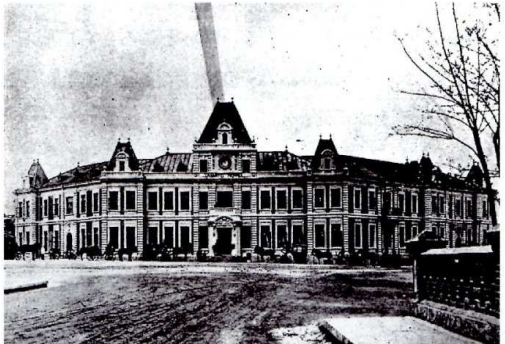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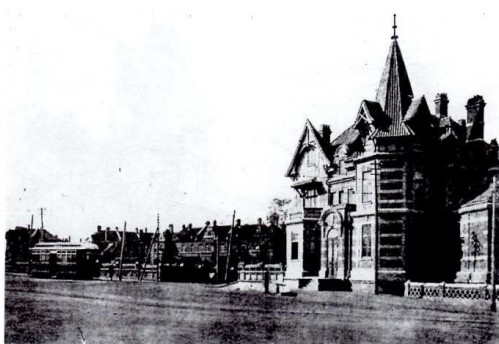


走出大连埠头往前直行，就来到了街里。往左走，越过三四个町，就看到了相生由太郎的家宅。在通过他家的路边两侧，都是他经营的地方，其中有图书馆，俱乐部，运动场，练武场，还有他部下的住宅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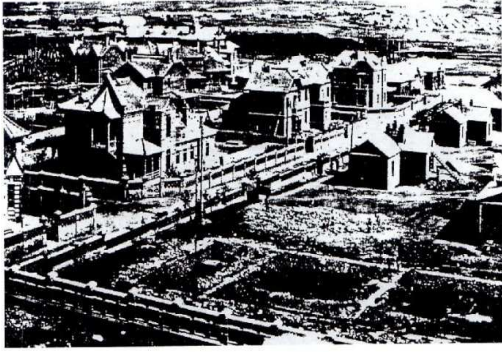
相生由太郎曾是满铁埠头事务所的所长，后来设立了福昌公司，包揽了海港

码头的货物运输及仓库运营等。每天待机的劳工在 1 万 5 千人左右，后来建起了收容劳工的大型设施“碧山庄”（红房子）。

应旧识佐藤友熊（当时旅顺的警长）的邀请，夏目漱石去旅顺参观了战利品馆，东鸡冠山，203 高地和旅顺港。14 日从旅顺返回大连，开始做下一步的旅行计划。行程计划是从大连—汤岗子—熊岳城—哈尔滨—奉天—抚顺—安东—韩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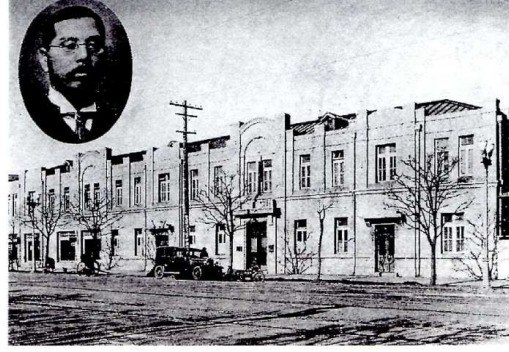
大文豪的满韩大旅行始于明治 42 年 9 月 2 日，同年 10 月 17 日返回日本。自 10 月 21 日开始，在《朝日新闻》连载了他写的“滿韓ところところ”，共连载了 51 回。他在旅行中的记录和日记等达 40 多页，而写出的内容连一半都不到，为什么途中停笔，成了永远的疑问。尽管如此，这些连载中的内容对后来人的研究仍起着重要作用。

 <p>丸船航船汽路航運大社會式株船航旅大 Shonan Kaishu Dairen Line S.S. "TETSUREI MARU"</p> <p>鐵嶺丸</p>	 <p>滿鐵總裁公邸</p>
<p>铁岭丸</p>	<p>满铁总裁官邸</p>
 <p>大連ヤマトホテル</p>	 <p>大連クラブ</p>
<p>大连大和宾馆</p>	<p>大连俱乐部</p>
 <p>川崎造船所</p>	 <p>中央試験場</p>
<p>川崎造船所</p>	<p>中央试验场</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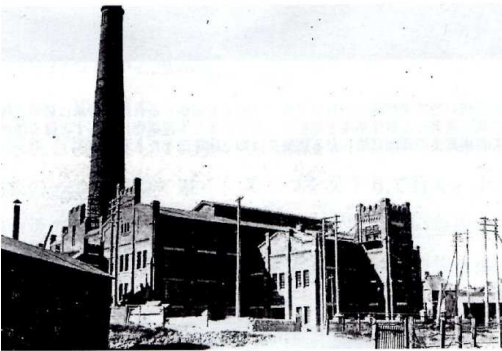
市街造成中の写真

街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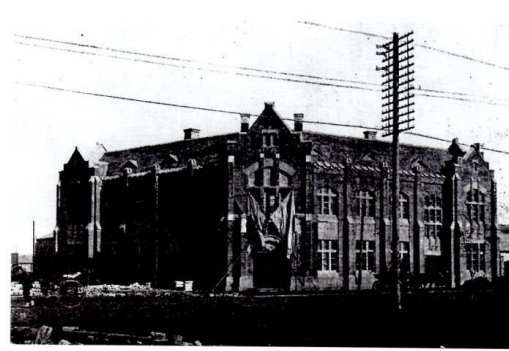
相生由太郎

相生由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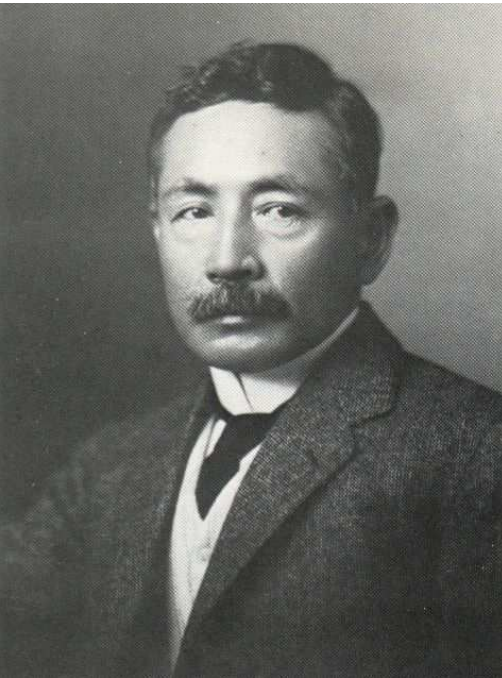
発電所

发电所



電気作業所

电气作业所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右一）与中村是公（左一）



资料来源：清流一叶新浪博客